

# 中国哲学史名词试解

《天津师院学报》资料室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 列宁语录

不能不看到哲学上的党派斗争，这种斗争归根到底表现着现代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思想体系。最新的哲学象在两千年前一样，也是有党性的。

# 毛主席语录

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 目 录

前言	1	生而知之	15
—		上知下愚	16
尊天神	2	克己复礼	16
反天神	3	忠恕	17
五行	3	中庸之道	17
八卦	4	礼治	18
阴阳	5	德治	19
乾坤	5	义利之辨	19
道器	5	《管子》	20
形而上和形而下	6	邓析	21
《周易》	6	少正卯	21
《尚书》	7	刑名之学	22
二		墨家	22
《周礼》	9	墨翟	23
柳下跖	9	非命	24
诸子百家	9	兼爱	25
儒家	10	法家	25
孔丘	11	李悝	26
《论语》	12	西门豹	26
《大学》	13	吴起	27
天命	13	法治	27
仁	14	耕战	28
正名	15	明法审令	28
		申不害	29

慎到	29
商鞅	30
《商君书》	31
思孟学派	31
子思	32
《中庸》	33
天人合一	34
慎独	34
内省	35
正心诚意	35
孟轲	35
《孟子》	36
道统	37
先知先觉	38
良知良能	38
性善论	39
仁政	39
王道和霸道	40
道家	41
老庄学派	42
老聃	42
《道德经》	43
无为	44
庄周	44
《庄子》	45
为我	46
形神	46
兵家	47
孙武及《孙子兵法》	48

孙臧及《孙臧兵法》	48
名家	49
惠施	49
公孙龙	50
《墨经》	51
荀况	52
《荀子》	53
天人相分	54
性恶论	54
韩非	55
《韩非子》	56
法、术、势	57
《礼记》	58
《仪礼》	58
杂家	59
农家	59
阴阳家	60
纵横家	60

### 三

陈胜、吴广起义	63
董仲舒	63
《春秋繁露》	65
神学目的论	65
三纲五常	65
性三品说	66
伦常	67
三统三正	67
天人感应	68

桑弘羊	68
《盐铁论》	69
讖纬	70
《白虎通义》	71
桓谭	72
王充	73
《论衡》	74

#### 四

黄巾起义	76
曹操	77
玄学	78
何晏	78
王弼	79
贵无论	80
郭象	80
裴颢	80
崇有论	81
《列子·杨朱篇》	81
鲍敬言	82
佛教	82
禅宗	83
范缜	84
《神灭论》	84

#### 五

傅奕	86
吕才	87
韩愈	87

李翱	88
柳宗元	89
《封建论》	89
刘禹锡	90
天人交相胜	90
黄巢起义	91

#### 六

王小波、李顺起义	93
周敦颐	93
邵雍	94
张载	95
虚空即气	96
程颢	96
程颐	97
二程	97
理学	98
程朱学派	99
心学	99
陆王学派	99
理先气后	99
格物致知	100
王安石	101
王安石新学	102
王安石的“三不足”思想	103
天道尚变	103
沈括	104
方腊起义	105
朱熹	105

《四书集注》	106
理一分殊	106
存天理,去人欲	107
陆九渊	107
陈亮	108
叶适	109
事功学派	110
红巾军起义	110
王守仁	110
致良知	111
知行合一	112
罗钦顺	113
王廷相	113
张居正	114
重“实效”	115
王艮	115
泰州学派	116
李贽	117
《焚书》	118
《藏书》	118
利欲说	119
李自成起义	120
黄宗羲	120
《明夷待访录》	121
顾炎武	122
王夫之	122
理在气中,道不离器	123
静者静动	124
知必以行为功	124

颜元	124
戴震	126
道主统 理主分	127
理存欲中	127

## 七

龚自珍	130
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	130
三元里平英团	131
魏源	131
天下物无独必有对	132
变古愈尽,便民愈甚	133
林则徐	133
太平天国革命	134
洪秀全	134
《天朝田亩制度》	135
乱极则治,暗极则光	136
洪仁玕	136
革故鼎新	137
新天、新地、新人、 新世界	137
曾国藩	138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139
戊戌变法	139
康有为	140
“三世说”	141
《大同书》	142
谭嗣同	142
《仁学》	143

严复 .....	144	资产阶级革命派 .....	148
《天演论》 .....	145	章炳麟 .....	149
“以太” .....	145	《尴书》 .....	151
体用一致 .....	146	孙中山 .....	151
洋务派 .....	146	三民主义 .....	153
张之洞 .....	147	知难行易 .....	154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	147	“生元论” .....	155
义和团运动 .....	147	“民生史观” .....	155



## 前 言

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各个时代先进阶级和反动阶级的阶级斗争，革新进步和保守倒退两种社会势力的斗争在哲学上的反映。贯彻毛主席关于“古为今用”的方针，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研究中国哲学史，从中汲取经验教训，把历史的斗争同现实的斗争结合起来，这对于我们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反修防修，把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广大工农兵读者学习一点中国哲学史的需要，我们在本院政史系协助下编写了这本名词试解。词的条目编排，大体以杨荣国同志主编的《简明中国哲学史》中名词出现的先后为序。我们编写这个中国哲学史名词试解，旨在对中国哲学史上唯物论和唯心论两条路线斗争中出现的若干名词术语，试作解释，但由于我们水平有限，时间仓促，缺点错误在所难免，请读者批评指正。

一九七六年六月



哲学上唯物主义路线与唯心主义路线的两军对战，是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反映。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不能不看到哲学上的党派斗争，这种斗争归根到底表现着现代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思想体系。最新的哲学象在两千年前一样，也是有党性的”。

早在公元前十四世纪到八世纪的我国殷周种族奴隶制时代，种族奴隶主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而乞灵于宗教神学，产生了尊天神的思想；与此相对立，奴隶在反抗奴隶主的残暴统治的斗争中，越来越“不畏于天”，在哲学上产生了朴素唯物主义的“五行”说和具有辩证因素的“八卦”说。这种反天神思想对尊天神思想的斗争，就是殷周奴隶制社会中唯物论同唯心论斗争的表现。

## 尊 天 神

一种有神论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公元前十四世纪前后，殷商奴隶主为巩固其统治地位，创造了一种至上神的观念，称为“帝”或“上帝”，被说成是上天和人世间的最高主宰。殷王把“上帝”当作父亲，自称是“上

帝”的儿子，就是说，他是上帝权力的化身。殷商奴隶主所宣扬的神学世界观，是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思想工具。

## 反 天 神

中国古代的一种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殷代和周初的统治者，为维护他们对奴隶的统治，制造和宣扬天神论，说什么上天有作为最高主宰的上帝神；殷王和周王都是上帝神的儿子，他们的统治权是上天授给的，如不遵从，就要受到天神的惩罚。到西周末年，阶级斗争日趋激烈，奴隶制统治出现危机，广大奴隶和劳动人民对天神论由怀疑开始走向反抗。奴隶在用怠工和逃亡等办法反抗奴隶主残暴压迫的斗争中，越来越变得“不畏于天”了。人们逐渐认识到社会上的事情并没有什么天神在支配着，“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zǔn tà）背憎，职竞由人”（《诗经·小雅·十月之交》），就是说人民大众所以受罪，并不是上天给予的；所有纷争与祸乱，主要是由人所造成的。这种观点，是对有神论、天命论的否定，是一种朴素唯物主义思想。

## 五 行

原指水、火、金、木、土五种物质。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五行”说认为，这五种物质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是构成万物的元素，称为“五行”。这种

“五行”说，长期在民间广泛流传，《尚书》、《左传》、《国语》等文献中，都有所记载。战国时代出现了“五行相生”、“五行相胜”之说。“相生”指相互促进，即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相胜”指相互排斥，即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木胜土，土胜水。“五行”，对我国古代天文、历数、医学等的发展起了一定作用。后来，“五行”说被唯心主义者神秘化，儒家思孟学派竟把五行的属性解释为仁、义、礼、智、信等奴隶主阶级的道德，用来为其宣扬奴隶主阶级思想服务。

## 八 卦

《周易》中的八种符号，即：乾☰，坤☷；震☳，巽☴；坎☵，离☲；艮☶，兑☱。用来表示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物质现象。八卦中每两卦都是对立的，如乾与坤，震与巽，坎与离，艮与兑。由于阴（--）、阳（—）是八卦的根本，它说明由阴阳两种气体互相结合交感而产生万物。而乾、坤两卦在八卦中具有特殊地位，是万物和人类社会一切现象的最初根源。八卦又以两卦相叠演为六十四卦，用来象征各种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发展变化。这种从正反两方面的矛盾对立来说明万物发展变化的思想，具有一定的朴素的辩证法因素。八卦的起源传说很早，大约产生于殷周交替的时候，曾于较长时期在民间流传。但在春秋战国时

期，被儒家所利用，把八卦变成神秘的概念。后世的一些宗教（如道教），也曾利用八卦来宣扬宗教迷信。

## 阴 阳

中国古代的一对哲学范畴，最早反映在殷末周初的《周易》一书中。阴阳的观念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与自然界长期斗争中逐渐产生的。阴阳最初的意义，是指日光的向背，正面为阳，背面为阴。古代劳动人民和思想家看到一切现象都有正反两个方面，便用阴阳这个概念来解释自然界两种对立和相互消长的物质势力。这是一种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并包含有辩证法因素。后来儒家和阴阳家为适应没落奴隶主阶级进行复辟活动的需要，对阴阳作了唯心主义的神秘解释，借以宣扬迷信思想。

## 乾 坤

《周易》中的中国古代哲学术语。乾表示阳性，坤表示阴性；乾代表天，坤代表地。整个宇宙被称为乾坤。乾坤还被引申为日月、男女、父母等。

## 道 器

中国哲学史上的一对范畴，道与器的关系相当精神与物质的关系。最早见于《易·系辞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里的“道”，是无形象的，

含有规律和准则的意义；“器”是有形象的，指具体事物或名物制度。关于道、器关系问题的不同解释，表现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唯心主义者（如董仲舒、韩愈、朱熹等）总是把“道”脱离“器”，或超越“器”来考察。朱熹宣称，“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断言“理在气先”，即“道”在“器”先，先有精神后有物质，物质是精神派生的。唯物主义者认为“道”不能离开“器”而存在，如清初王夫之反驳了朱熹的谬论，他说：“无其器则无其道”，形而上的道离不开形而下的器，坚持了器在道先，先有物质后有精神，精神是由物质派生的正确观点。

## 形而上和形而下

中国古代哲学术语。最早见于《周易》。《易·系辞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是指无形的道理、法则、精神等。形而下指有形的物质、事物等。围绕着“形而上”的“道”和“形而下”的“器”，什么是第一性的问题，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承认“形而下”的器是第一性的，是唯物主义观点，反之则是唯心主义观点。

## 《周易》

· 我国古代具有哲学思想的占卦用书，亦称《易》；

儒家把它列为“五经”之一，称《易经》。分《经》、《传》两部分。《经》包括卦、卦辞和爻辞，是殷末周初时期的著作。《传》是对卦辞爻辞的注释和论述，可能是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周易》的整个体系是宗教唯心主义的，是为奴隶主阶级服务的。但其中的“八卦”说、“阴阳”说以及对立物交感产生新的事物和推动事物发展变化的观念，则含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因素。卦辞和爻辞中也吸收了一些当时人们日常生活的经验和生产知识。一贯鼓吹天命论的孔丘，到了晚年，他的复辟奴隶制的迷梦日益破灭，因此特别喜欢读《周易》，以致使简册（古代把字写在竹片或木条上，叫简，把简用绳子连缀成册）的皮绳断了好多次，妄图从宗教迷信体系中寻找反革命思想武器，挽救行将崩溃的奴隶制。叛徒、卖国贼林彪教子读经，叫他的儿子学习孔丘读《易经》的“韦编三绝”精神，也是想从中寻找他们搞反革命复辟活动的思想武器。

## 《尚 书》

我国奴隶制时代（夏、商、周）的官方政治文告和历史材料的汇编，但许多篇经过后来儒家门徒改编和补充。孔丘曾插手编选。《尚书》中保留了商、周特别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但书中包含有大量的儒家思想。汉以后，儒家把它列为“五经”之一，称《书经》，作为统治人民的思想工具。

## 二

春秋战国时代，是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社会大变革时代。奴隶制走向衰亡，新兴地主势力逐渐抬头，奴隶为争取解放不断进行斗争，发生了以柳下跖为首的大规模的奴隶起义，自由民在向新兴势力转化过程中为反对奴隶主贵族的虐政也经常暴动，这个时期的阶级斗争空前尖锐、激烈。反映在思想领域里，形成了我国古代学术思想史上所谓“百家争鸣”的局面。

在“百家争鸣”中，基本上是儒、法两家的对立。这是没落奴隶主贵族和新兴地主阶级在思想政治路线上生死搏斗的反映。在哲学上，法家(及其同盟者)对儒家的斗争则是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主要表现为反天命与尊天命思想的对立，无神论与宗教思想的对立。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儒家如孔丘、孟轲等(及其同盟者老庄学派)，宣扬天命思想、唯心论的先验论和天才论。而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如商鞅、荀况、韩非等(及其同盟者墨家、兵家、名家)用“天人相分”的唯物主义观点来批判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天人相与”的天命论思想；在认识论上，法家朴素唯物论的反映论对儒家唯心论的先验论也展开了激烈斗争，



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卓越思想。

## 《周 礼》

也称《周官》，成书于战国时代。实际上是记述战国时代各国官制，并由儒者依据儒家的理想方案增减排比而成的官制汇编。它被列为儒家经典《十三经》之一，是儒家推行其“礼治”的一个根据。

## 柳 下 跖

姓展，名跖，因住在柳下（在今山东省西部），又叫柳下跖。春秋末年奴隶起义的杰出领袖。他领导奴隶九千多人起义，沉重打击了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动摇了奴隶制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有力地推动了历史的前进，显示了奴隶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

柳下跖对妄图以“仁义”说教劝诱投降的孔丘做了无情的揭露，批判了孔丘效法先王的复古倒退政治主张，和“诈巧虚伪”的忠孝仁义思想，痛骂孔丘是“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摇唇鼓舌，擅生是非”的政客，是“罪大极重”的“盗丘”，是“作言造语、妄称文武”的“巧伪人”。他强烈渴望建立一个“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的平等社会，对奴隶主贵族的反动统治进行了决死的斗争。

## 诸 子 百 家

春秋战国至汉初学术思想派别的总称。当时是从奴

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社会大变革时期，代表不同阶级阶层的学派纷纷出现，形成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上的所谓“百家争鸣”局面。诸子指各学派代表人物，如孔丘（孔子）、老聃（老子）、墨翟（墨子）、商鞅、荀况（荀子）、韩非（韩非子）等。百家指各学派，如儒家、法家、道家、墨家、名家、兵家等。在这“百家争鸣”中，主要是儒法两家对立，这是没落奴隶主阶级和新兴地主阶级在思想政治路线上的生死搏斗。儒家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在“克己复礼”的纲领下妄图恢复西周奴隶制；法家代表新兴地主阶级，提出变法革新的纲领，来建立和巩固封建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其他学派，分别依其对待奴隶制和封建制的态度而站到这两条战线中的一边。在哲学思想上法家及其同盟者对儒家的斗争，则是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主要表现为反天命与尊天命思想的对立，无神论与宗教思想的对立。

## 儒 家

春秋战国时期，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利益的反动学派，创始人是孔丘，第二个代表人物是孟轲，故儒家反动学说又称为儒学、孔学或孔孟之道。

在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社会大变革时期，儒家顽固地站在没落奴隶主阶级立场，提出“克己复礼”的反动政治纲领，妄图恢复西周时期在“井田制”经济基础上

的宗法、分封、世袭等全部奴隶制上层建筑。为了替他们的复辟行为作辩护，在哲学上狂热鼓吹唯心论的“天命论”和“生而知之”的先验论，鼓吹一代不如一代的历史倒退论，形成了一个反对革命，反对进步，主张复辟，主张倒退的反动思想体系。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同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西汉以后，儒家又逐步演变为走向没落的中国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统治思想。毛主席说：“那时的统治阶级都拿孔夫子的道理教学生，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头子，从陈独秀、王明到刘少奇、林彪，也都把反动儒学作为他们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破烂武器。他们取儒家之经，学孔孟之道，搞复辟倒退。孔孟之道成为修正主义的重要思想根源之一。因此，结合反修防修的斗争，继续批孔，还是长期的战斗任务。

## 孔 丘

孔丘（公元前551——前479年），字仲尼，排行老二，春秋末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没落奴隶主贵族思想家，儒家学派创始人。他生活在奴隶制崩溃，封建制兴起的社会大变革时期，一生为维护 and 挽救奴隶制奔走卖命。他曾游说各国诸侯，推行反革命主张，进行复辟活动，到处碰壁。他又通过所谓办教育，删改史书，

制造舆论，培植反革命势力，妄图复辟奴隶制度。在鲁国代行宰相时，一上台就杀了法家的先驱者少正卯，暴露出他这个奴隶制维护者的穷凶极恶的反动嘴脸。孔丘建立了一套以“仁”为核心的反动思想体系，提出“克己复礼”的反动复辟纲领，抛出一条“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反动政治路线，宣扬“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天命论，“生而知之”的先验论，以及“学而优则仕”，鄙视生产劳动的反动教育思想。孔丘的主要言行由他的门徒记载下来，编成《论语》一书。古今中外一切反动派和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把孔丘捧上天，把它的反动思想作为毒害人民，破坏革命的工具。由于孔丘的反动思想为历代反动统治阶级所宣扬，流毒很深，所以批判孔学仍然是我们一项长期的战斗任务。

## 《论 语》

《论语》是没落奴隶主阶级代言人孔丘的反动言行集，约于公元前五世纪由孔丘的门徒编凑而成，是儒家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全书共分二十篇，集中反映了孔丘反动的社会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论语》在历史上起了极其反动的作用，两千年来，它被儒家和反动统治者奉为“经典”；宋朝以后，被法定为封建知识分子的必读课本和科举考试科目，它是历代反动阶级统治人民的精神工具。人民公敌蒋介石吹捧《论语》是“中国的政

治，是永远不变的原则”，叛徒刘少奇和卖国贼林彪也对它推崇备至，把它作为复辟资本主义的思想武器。

## 《大 学》

原为秦汉时期儒家编写的《礼记》中的一篇，共一千七百多字。内容主要是宣扬反动的“人性论”和唯心论的先验论，并大肆鼓吹“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养经和反动统治术，作为复辟倒退路线的理论武器。南宋反动理学家朱熹把它从《礼记》中抽出来，和《论语》、《孟子》、《中庸》合编为《四书》，成为封建统治阶级反动政治哲学的“经典”，流毒甚广。

## 天 命

唯心主义者虚构的至高无上的神的意志和命令。殷代奴隶主统治者为了统治人民的需要，创造了作为最高主宰的上帝神，说殷王的统治是上天所授命。周代统治者灭殷之后，也同样宣扬这一点，周王以上帝儿子自居，认为周代替殷是上天所授命的。西周末年，随着奴隶制统治危机的加深，人们对统治阶级的天命论日益产生怀疑和动摇。孔丘为了复辟奴隶制的政治需要，便竭力维护和宣扬天命论，他提出“畏天命”，“死生有命，

“富贵在天”等论调，实际上是要人们无条件地服从奴隶主贵族的意志和命令。后来的反动统治阶级也都把“天命”作为维护其统治和搞复辟倒退的思想武器。但历代劳动人民和具有唯物主义思想的进步思想家，一直对有神论的天命论进行了尖锐的斗争。不断给天命观的反动说教以致命的打击。林彪自比“天马”、狂吠“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结果自取灭亡，又一次证明了天命论的破产。

## 仁

“仁”原是殷周奴隶主贵族的道德范畴，孔丘把它和天命联系起来，说成是上帝赋予人的先验的东西，竭力予以强调和发挥，把它作为自己思想体系的核心。孔丘讲“仁”，是为推行其维护和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纲领“克己复礼”服务的，即“克己复礼为仁”。他还把“孝弟”作为实行“仁”的根本，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妄图用“孝弟”驯化奴隶，防止他们“犯上作乱”；也用“孝弟”来维护奴隶主贵族之间的宗法关系。孔丘也曾把“仁”解释为“爱人”，但他并不把奴隶看成人，因此这种超阶级的说教只是一种欺骗。孔丘的“仁”的思想，为后来反动统治阶级所承袭，他们大肆鼓吹“仁政”、“仁义道德”，用以掩盖他们反革命专政的实质。

## 正 名

孔丘为挽救奴隶制而提出的反动谬论，是“克己复礼”反动政治纲领的重要组成部分。孔丘认为政治活动的首要任务是“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正，指纠正；名，指等级名分。春秋末期，封建制生产关系正在发展，奴隶制走向崩溃，社会经济基础和阶级关系发生急剧变化，破坏了“周礼”所规定的“君臣父子”等级名分。孔丘提出“正名”，是要用旧的名分来规定当时新的现实，即是让改变了的现实来服从不变的名分，借此来维护奴隶制社会的旧秩序。后来，荀况所说的“正名”，指的是“制名以指实”，就是要制定新的“名”以符合变化了的客观事实，推行法家路线，确立封建制度。这与孔丘的“正名”论有本质区别。儒家的“正名”论，一向为反动复辟势力所利用。林彪就曾狂叫“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妄图抢班夺权，把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攫取到自己手中，“名正言顺”地复辟资本主义，建立其封建买办法西斯王朝。

## 生而知之

孔丘鼓吹的唯心论的先验论。所谓“生而知之”，就是说有人一生下来就有知识，不必通过后天的实践。

为了复辟奴隶制，孔丘把这种反动理论同奴隶制的等级观念联系起来，说什么“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宣扬奴隶主阶级头子和“圣人”是“生而知之”的上等人，奴隶则是天生愚蠢，“困而不学”的最下等人。这种谬论，完全颠倒了知识和实践的关系，鼓吹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是十分反动的。

### 上 知 下 愚

“知”同“智”。孔丘叫嚣：“唯上知与下愚不移”。他所说的“上知”，指的是奴隶主贵族；他所说的“下愚”，指的是奴隶和劳动人民。“上知”的人天生就聪明智慧，“下愚”的人天生就愚蠢笨拙，而且是不可改变的。孔丘宣扬这种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和英雄史观，是为奴隶主贵族永远统治和剥削奴隶制造理论根据。叛徒、卖国贼林彪也贩卖孔老二这一套，说什么“我们的思想与他们（指劳动人民）的思想有天壤区别”，恶毒诬蔑劳动人民想的只是“油盐酱醋柴、妻子儿女”。

### 克 己 复 礼

孔丘提出的复辟奴隶制的反动政治纲领。“克己”是手段，“复礼”是目的。意思是要人民约束自己的行动，克制自己的欲望，一切言行都要服从西周奴隶制的



旧礼制、旧秩序。目的是反对奴隶起义，反对新兴地主阶级的兴起，反对社会变革，大开历史倒车。历史上的一切反动派，从赵高、王莽到袁世凯、蒋介石，无不把“克己复礼”作为他们搞反革命复辟活动的一面旗帜。中国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都拣起这面破旗挥舞。林彪就曾把孔丘的“克己复礼”当作万事中的大事，妄图发动反革命政变，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 忠 恕

孔丘“仁”的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忠”，就是要人们尽心竭力为奴隶主阶级卖命。“恕”，是要奴隶主阶级内部大小奴隶主之间按“周礼”规定的等级名分，互相体谅，推己及人，以维护奴隶主阶级的共同的利益。孔丘宣扬对奴隶主阶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此麻痹劳动人民的斗志。至于对待奴隶和革新派人士，则从来就是残酷镇压，根本谈不上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后来的反动统治阶级，都把“忠恕”作为统治人民的思想工具之一。卖国贼林彪也曾对“恕”字加批语：“以仁爱之心待人之忠，以宽宥原谅之恕，儒家的原理”。充分说明他是孔孟之道的忠实信徒。

## 中庸之道

儒家反对社会变革的反动理论。孔丘说：“中庸之

为德，其至矣乎！”把中庸看成最高的“道德”。后来子思对中庸之道大加发挥，宋代程朱理学更把“中庸”说成是天下永恒不变的定理。“中”就是不要偏离，“庸”就是常久不变。孔丘鼓吹“中庸”，表面上是讲不偏不倚，其实是用折中主义手法欺骗人民、妄图调和社  
会矛盾，抹煞阶级斗争，要人们凡事不要作得过甚，从而取消新兴地主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奴隶制的革命，维护旧制度和旧秩序。历代反动统治阶级，都曾利用“中庸之道”。叛徒、卖国贼林彪叫嚣“中庸之道……合理”，其罪恶目的，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反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 礼 治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提出的反动政治主张。它要求按“周礼”来进行统治，强调要绝对遵从“周礼”，实即西周奴隶制。它包括一整套分封、世袭的等级制度以及  
与这些制度相联系的礼节仪式。“礼治”决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而是极端残酷的奴隶主阶级专政。“礼治”本身就包括有刑罚。统治阶级用他们的“礼”作为“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的唯一标准，谁敢“越礼”，就要被镇压。在春秋末年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社会大变革中，孔丘提倡“礼治”，并叫嚣“克己

复礼”，就是要维护奴隶主贵族的特权地位和复辟奴隶制度。它和新兴地主阶级的“法治”主张是相对立的。后来历代反动派也打着“礼治”的旗号，作为维护和复辟旧制度的思想武器。

## 德 治

儒家的反动政治主张。春秋战国社会大变革时期，儒家为了推行复辟奴隶制的“礼治”，反对新兴地主阶级的“法治”，极力鼓吹“德治”。孔丘提出“为政以德”，孟轲也说要“以德服人”才能使人心悦诚服地接受统治。表面上他们反对用“刑”、用“力”来进行统治，其实是奴隶主阶级反革命两手中的一手，是用虚伪的奴隶主道德来麻醉毒害劳动人民，掩盖其血腥的奴隶主专政。历代反动统治者，时常拣起儒家“德治”的破旗，一方面来美化自己的反革命专政，一方面来攻击革命阶级的专政。林彪用“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的语言来攻击无产阶级革命暴力，暴露了他的反革命真面目。

## 义 利 之 辨

中国哲学史上政治、伦理思想方面长期争论的问题。实质上是如何看待功利主义的问题。儒家标榜重义轻利。孔丘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认为统治者明白大义，劳动人民只知道小利。孟轲鼓吹：“王

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妄图用“仁”“义”道德的说教，抹杀劳动人民、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否定劳动人民、新兴地主阶级反对奴隶制的斗争。实际上，这是儒家用超功利主义、反功利主义的伪装，来掩盖他们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同时否定和抹杀革命阶级的功利主义。法家针对儒家重义轻利的虚伪性，公开宣扬新兴地主阶级的功利主义。孙武主张“非利不动”，韩非提倡“明割利害以致其功”。后来，在反动统治者和革新派之间，特别是在剥削阶级和劳动人民之间，始终存在着进步的、革命的功利主义和伪装的反动功利主义的斗争。

## 《管子》

反映春秋初期著名法家先驱管仲思想的著作，除了个别篇可能是管仲遗著外，实系后人对管仲思想言行的记载、解释和发挥。它基本上是战国时代齐国法家的作品。现存七十六篇。《管子》阐述了管仲的法治思想，主张“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批判了“井田制”，主张“与民分货”（实物地租）和“相地而衰征”（按田地质量好坏分等征税）。还提出发展盐铁、矿产、森林、商业、水利等事业。阐述了管仲的朴素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认为水和气是万物的本原。批判了“天命论”，认为四季变化，日夜交替都是自然界本身的变化。看到客观现实存在许多矛盾，提出了反映这些矛盾

的概念，如兴废、治乱、安危等，含有朴素辩证法因素。此外，还记述了关于天文、地理等自然方面的知识。《管子》关于法治思想的论述，对以后法家有着深刻影响。但《管子》书中还掺杂了一些其他学派的作品。

## 邓 析

邓析（？——公元前501年），早期法家人物，春秋时期郑国人。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宣传“法治”思想，主张“不法先王，不是礼义”；反对儒家复古、倒退的路线，坚持厚今薄古的进化史观。他否认天有意志，认为天事与人事无关；反对孔丘唯心论的“正名”观点，主张“循名责实”，名实相副的为“是”，名不副实的为“非”，在认识论上坚持了朴素唯物主义。他还编写了一部体现新兴地主阶级意志的刑法，因为写在竹简上，叫做“竹刑”（已失传）。邓析后被郑国奴隶主贵族杀害。今存《邓析子》一书，部分反映了邓析的思想。

## 少 正 卯

少正卯（？——公元前498年），春秋末期鲁国人，早期法家人物。他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上，主张以封建制代替腐朽的奴隶制；强调人为，反对天命；坚持进化史观，反对复古倒退。他和孔丘同时在鲁国讲学，

大造革命舆论，吸引了许多听众，连孔丘的绝大多数学生都多次跑到他那里去听讲，引起了顽固维护奴隶制的孔丘的极端仇视。公元前498年，孔丘当上鲁国的司寇（相当司法部长）并代理宰相职务时，上任不久即把少正卯杀害。这说明儒法两家从产生之日起，它们之间就展开了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你死我活的激烈斗争。

## 刑名之学

“刑”同“形”，指形体、事实，也指刑法。“名”指名称。刑名之学，就是研究名与实关系的学问。春秋战国社会大变革时期，法家和名家都着重研究了“形”和“名”的关系，批判了儒家用旧的“名”去否定新的“实”的正名论，认为名是根据事实定的，事实在不断发展变化，旧的名与新的事实不相适应了，就应当革除旧的名，建立新的名，并以此来肯定社会变革，以维护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同时，新兴地主阶级为了巩固封建制度，推行法治，也需要解释法律条文，研究刑法的名称。因此，后人把法家和名家的学说称为“刑名之学”。

## 墨家

先秦时期基本上代表小生产者阶层（实际上是奴隶社会的自由民阶层）利益的学派。有初期墨家和后期墨家之分。初期墨家以墨翟为中心，与代表没落奴隶主阶

级利益的儒家处于对立的地位。墨翟以“非命”思想反对儒家“天命论”；以“兼爱”思想反对儒家“亲亲有术（杀）”的“仁”的说教；以“节葬”“非乐”“节用”等主张反对儒家“繁饰礼乐”“厚葬久丧”。后期墨家出现于战国后期，思想上与法家较为接近。他们认为历史是变化发展的，提出要“察名实”，即要求人们根据事实来确定名分，反对儒家的“正名论”，这实质上也是否定天命思想。后期墨家抛弃了初期墨家学说中“天志”“明鬼”等迷信成分，发展了它的积极部分，对科学思想，比如相当于今日的几何、力学、光学等原理，都有一定的研究和贡献。在认识论上，他们发展了墨翟重视感觉经验的观点，但纠正了墨翟单纯经验论的缺陷，认为人的认识过程不能停留在感觉经验的阶段，还要经过“心之察”“心之辨”的思维推理以便使认识深化；他们还提出了一套逻辑方法，其中一些论式在某些方面已和近代逻辑学有所接近。后期墨家在儒法斗争中，起了法家同盟军的作用。但墨家思想（特别是前期墨家）有很大局限性，墨翟的“兼爱”思想实际上是一种阶级调和论；他的“天志”“明鬼”思想，相信鬼神，具有唯心主义落后的一面。

## 墨 翟

墨翟(约公元前478——前392年)，鲁国人，墨家学派的创始人，春秋战国之际代表小生产阶层的思想家。

其思想主要保存于《墨子》一书里。在春秋战国之际封建制取代奴隶制的社会剧烈变革中，墨翟对孔丘为代表的儒家学说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针对孔丘的“爱有差等”，提出了“兼爱”思想，认为“爱”不应当有亲疏贵贱之别。他反对奴隶主贵族的“世卿世禄”制度，主张“尚贤”，让“农与工肆（市）之人”参加政治。他反对儒家的“天命论”，提倡“非命”；并批判了孔丘“生而知之”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强调知识是后天形成的。提出判断真理的三条标准——“三表法”：一是接受前人的经验，二是考察百姓耳闻目见的经验，三是看实际效果是否有利于人民。墨翟的学说反映了小生产阶层的利益，客观上为新兴地主阶级夺取政权制造了舆论。但他的“兼爱”、“尚贤”、“非攻”等思想包含有很大的人性论的成分。他把他的政治主张的实行，寄托在贤明的君主身上，还讲“天志”、“明鬼”，主张相信鬼神，这是唯心主义，反映了小生产阶层的软弱性。他的认识论是唯物主义的~~经验论~~经验论，他重视“耳目之实”的感性认识，但轻视了理性认识的意义。在社会变革问题上的主张是不彻底的，这是他的小生产阶层的阶级局限。

## 非 命

春秋战国之际墨翟提出的同宿命论相对立的学说。在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社会大变革中，墨翟代表小



生产者阶层的利益，提出“非命”的主张，反对儒家鼓吹的“天命”论。墨翟认为“命者暴王所作”，就是说，“天命”是暴君编造出来欺骗人民的。他反对天命，主张人力，提出“强必治，不强必乱”，“强必饱，不强必饥”，主张人们尽力而为，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这是一种唯物主义思想。但墨翟不懂得社会上人民“陷于饥寒”并不是单纯等待命运的结果，而是统治阶级剥削压迫的结果，从这里可以看出“非命”思想的局限性。

## 兼 爱

墨翟的一种社会政治思想。墨翟站在小生产阶层的立场上，反对孔丘强调讲亲疏差别的“仁”，提出了“兼爱”思想，即主张互爱互利，用无差别、无等级的爱来代替儒家有差别、有等级的爱。它对儒家关于“仁”的反动说教，起到了揭露和批判作用。但这种超阶级、无差别的“兼爱”，只是一种幻想。实际上是一种阶级调和论，这反映了墨翟的阶级局限性。

## 法 家

春秋战国时期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一个学派。它反对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利益的儒家鼓吹的“礼治”，主张“法治”，被称为法家。主要代表人物有商鞅、荀况、韩非等。法家进行封建主义的变法革新，打击旧贵

族的顽固势力，在变法中提出并发展了地主阶级的政治和法权理论；针锋相对地批判反动的儒家哲学，坚持唯物论，坚持进步变革的历史观。由于法家的政治和思想路线顺应了当时历史发展的要求，终于在劳动人民反抗奴隶制斗争的基础上取得了胜利。

汉代中期以后，随着地主阶级封建统治的巩固和逐步转向反动，法家演变为地主阶级内部的革新派的代表，继续与代表地主阶级顽固派的儒家相对立。

## 李 悝

李悝又名李克（约公元前455——前395年），魏国人。战国初期的著名法家。魏文侯时任魏相。为了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彻底推翻奴隶制度，李悝在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了改革，他提出“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的原则，废除奴隶制的世卿世禄制，按功劳和能力选拔官吏，以剥夺奴隶主贵族的政治特权。颁布“尽地力之教”，鼓励包括个体农民在内的新兴力量挖掘土地潜力，提高产量，以巩固和扩大封建经济基础。他还编了一部《法经》，从法律上保护新兴地主阶级的所有制（这部书到汉代已经失传）。李悝的变法使魏国成为战国初期的强国之一。

## 西 门 豹

战国初期法家代表人物之一，我国古代杰出的战斗

无神论者。他在魏国拥护和推行李悝的“法治”路线，坚持反对唯心主义的宗教神学。在治理邺地（今河北省临漳县）时，大破“河伯娶妇”的迷信骗局，惩治了凭借宗教迷信残害人民的奴隶主腐朽势力，用实际行动坚持了唯物主义观点。他还按照李悝的“尽地力之教”的主张，发扬人定胜天的思想，发动邺地群众开凿渠道，引漳河水灌田，使“水不为患，而田益饶沃”，发展了农业生产。西门豹的思想和行动，对儒家鼓吹的唯心论的天命论，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 吴 起

吴起（？——公元前381年），战国前期的法家代表人物。原是卫国人，早年曾在鲁国学兵法，后到魏国当西河太守，由于受到旧势力的排挤，又投奔楚国。公元前382年，在楚悼王的支持下，在楚国推行法治。他主张“废公族”，凡是分封已传三代以上的贵族，统统取消爵禄；强调“明法审令”，推行封建法制。吴起变法，沉重打击了奴隶主旧贵族势力。楚悼王一死，奴隶主贵族复辟势力起来猖狂反攻倒算，用乱箭将吴起射死。

## 法 治

先秦法家为维护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所提出的政治路线，与儒家的“礼治”路线相对立。它要求适应历史的发展，变革社会制度，“以法治国”。在经济上主张

废除奴隶制的井田制，要求承认土地私有；政治上反对奴隶制的宗法等级制度和“世卿世禄”的世袭制，主张按照地主阶级的政治标准选拔官吏。它要求建立封建官僚制度，反对奴隶主阶级的分封制，主张实行地主阶级的中央集权制。他们要求把这些主张制定为国家的成文法律，予以公布，做到“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这种“法治”，实质是地主阶级专政。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大变革时代，“法治”路线同历史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对于促进社会的发展起着进步作用。但是，它毕竟是地主阶级专政的表现形式，其中包括了对劳动人民的镇压。

## 耕 战

战国时商鞅在秦国变法中的一项重要政策，又叫农战政策，是法家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耕战政策把农业生产作为立国的根本，同时重视军事的作用。商鞅的主要措施是奖励男耕女织，重农抑商，发展生产，奖励作战有功的人员，按军功大小授田和授予官爵，并提倡公战，禁止私斗。这些措施促进了封建经济的发展，打击了奴隶主阶级的世袭特权，有利于新兴地主阶级社会地位的上升和政权的巩固。

## 明 法 审 令

明确法律，审定条令。这是战国初期法家吴起到楚

国任相时，针对儒家的“克己复礼”而提出的政治主张。他曾在楚国积极整顿法纪，对破坏国家法令的，不论亲疏贵贱，都要按法惩罚。推行这一革新措施，有力地打击了奴隶主贵族势力。

## 申 不 害

申不害（公元前385——前337年），郑国人，战国中期的法家人物。他曾在韩国辅佐昭侯推行法家路线，使韩国富强起来。他主张“明法察令”，颁布了改革政治、经济的新法令。他强调“术”的作用，“术”是君主操纵国家机器和驾驭群众的方法和策略。他认为要用“法”来否定儒家的“礼”，但如果没有“术”来控制各级官吏，就不能保证“法”的施行，就不能打击奴隶主贵族势力。他反对儒家主张的分封制，强调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申不害的这些主张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代表他的思想的有《申子》一书，现仅存《大体》一篇。

## 慎 到

慎到（公元前395——前315年），战国时期的法家，赵国人，曾在齐国讲学。慎到强调“立法”，建立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秩序；主张用“势”来推行法治。慎到讲“势”，是主张树立封建君主的权威，反对儒家鼓吹的要有天生圣贤才能做统治者的说教。他认为，势位是封

建君主不可缺少的东西，法又是治理国家实行赏罚的衡量标准，这是比较强调从客观事实出发的观点。但慎到早年曾受道家影响，他的思想中也杂有“因循”自然消极无为的道家观点。代表慎到思想的著作《慎子》，仅存残篇七篇。

## 商 鞅

商鞅（？——公元前338年），战国时期卫国人。原姓公孙，名鞅，后来到秦国，因功封于商，称商君，又叫商鞅，是前期法家最杰出的代表。秦孝公时，他被任为左庶长，在秦国执政十八年，进行了两次大改革，即著名的“商鞅变法”，严厉地打击了奴隶主贵族，对建立和巩固地主阶级专政起了重要作用。秦孝公死后，奴隶主贵族进行反扑，用车裂的酷刑杀害了商鞅。

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是：“开阡陌封疆”，进一步破坏奴隶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确认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变法易俗”，废除奴隶主贵族的“世卿世禄”制度，剥夺奴隶主贵族特权；加强中央集权，把秦国划分为三十一个县，实行郡县制；实行奖励耕战政策，规定凡能提高生产的奴隶可以改变身分，有军功的授以不同爵位；统一度量衡制度，等等。

商鞅为了变法革新，提出了“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的社会发展观，反对守旧，厚今薄古。他反对儒家的“天命”，主张依靠人力，特别强调革命暴力，

表现了朴素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他强调事物是发展变化的，主张“以战去战”，“以刑去刑”，表现了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商鞅的鲜明的法家政治思想路线，必然与儒家的政治思想路线产生尖锐的矛盾和斗争。商鞅坚决反对儒家的“仁义”、“孝悌”、“礼乐”、“诗书”等反动说教，把儒家思想比为害人的“虱子”。他曾“燔诗书而明法令”，烧掉了儒家反动书籍，并镇压了七百多个阴谋复辟的旧贵族和反动儒生，巩固了地主阶级的专政。

商鞅的思想保留在《商君书》中，是充满战斗精神的早期法家文献。

## 《商君书》

《商君书》，又名《农战书》，系由商鞅后的法家编撰而成，记载了著名法家商鞅的法治思想和变法斗争事迹。全书共五卷，二十九篇，现存二十四篇。《商君书》概括了前期法家的法治思想，总结了商鞅十八年变法的实践经验，初步奠定了法家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当时新兴地主阶级的一部重要理论著作，对以后的法家有很大影响。

## 思孟学派

战国时期以子思、孟轲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子思姓孔名伋，是孔丘之孙，孟轲是子思的再传弟子。思

孟学派继承和发挥了孔丘的反动思想，在政治上鼓吹复古倒退，疯狂反对法家变法革新的路线，妄图维护和复辟奴隶制。在哲学上，宣扬主观唯心主义世界观和认识论。子思把“诚”说成是天赋的“人性”中固有的东西，鼓吹“存诚尽性”，胡说只要把握这固有的“诚”，充分发挥人的本性，就可以达到“至诚通神”、“至诚通天”，进入“天人合一”的境界。他还拚命贩卖反动的“中庸之道”。孟轲胡说“万物皆备于我”，即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他内心的“诚”的表现，万事万物都在他心中，这是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孟轲还宣扬“先知”和“天才”的唯心论的天才论以及超阶级的“性善论”。思孟学派流毒深远，为历代反动阶级所推崇。后来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朱熹的“性命”论、王守仁的“致良知”、曾国藩的以“诚”自我标榜，都是思孟学派的唯心主义谬论的翻版。

## 子 思

子思（约公元前483——前402年），孔丘的孙子，叫孔伋，儒家思孟学派的代表人物。代表他的思想的有《中庸》一书。子思继承并发挥了孔丘的“仁”的主观唯心论思想，提出了“诚”这个先验的、主观的范畴。他说：“诚者，自成也。”把诚说成是人的本性，是人心所固有的东西。又说“天命之谓性”，把“性”说成



是上天给的。子思进一步提出“存诚尽性”，就是说人只要把握自身所固有的“诚”，充分发挥人的本性，就可以从“尽人性”到“尽物性”，最终做到“至诚通神”、“至诚通天”，进入“天人合一”的境界。子思为了维护和复辟奴隶制，还发挥了孔丘的中庸之道，表面上讲不偏不倚，其实是要调和社会矛盾，抹煞阶级斗争。在社会急剧变革的春秋战国之际，他一面大骂起义的奴隶是“小人反中庸”，一面极力宣扬王道，妄图压制奴隶反抗，维护旧统治。

## 《中 庸》

传说是孔丘的孙子子思所作，秦汉时期的儒家把它编在《礼记》一书中。《中庸》鼓吹孔丘提出的“中庸之道”，宣扬“中和为用”的阶级调和论和“不偏不倚”的折中主义哲学。还把“天命”和“人性”结合起来，鼓吹主观唯心主义的“天人合一”思想。由于《中庸》所宣扬的唯心主义哲学对剥削阶级极为有利，所以后来的剥削阶级统治者对它推崇备至。南宋反动理学家朱熹把它列为《四书》之一，作为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必读的“经典”。以后，汉奸刽子手曾国藩、国民党反动派头子蒋介石都鼓吹《中庸》的所谓“诚”。叛徒刘少奇在他的黑《修养》中贩卖《中庸》的所谓“慎独”；卖国贼林彪竟胡说“中庸之道，合理”。他们都是出于反动

阶级的政治需要，利用《中庸》来欺骗和麻痹人民。

## 天人合一

儒家关于天人关系的反动谬论。战国时代，子思、孟轲从殷周奴隶主统治者和孔丘宣扬的“天命论”出发，解释天与人的关系，把“诚”作为人的本性，宣扬守住这个本性加以充分发挥，人就可以知“天”，“至诚通天”。鼓吹只要通过自我修养，把内心中固有的“善性”扩而充之，人就可以达到“上下与天地同流”的境界，即所谓“天人合一”。他们宣扬这种唯心主义谬论的目的，是把奴隶主阶级的统治秩序和道德规范说成是符合“天”意，不得违抗的，从而加强对人民的思想控制。后来，汉儒董仲舒将“天人合一”论系统化、神秘化，明确地提出“天人一也”，宣扬人世间的一切，包括封建王权的统治，都是上天有目的的安排；并说天能干预人事，人的行为也能感应上天，把儒家“天人合一”论发挥为“天人感应”论。

## 慎 独

儒家思孟学派宣扬的唯心主义修养方法。《中庸》说：“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意思是说即使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也必须严格遵守奴隶制的等级名分，并且要通过个人内心的反省排除一切不合于奴隶制度的意识，体验上天所赋予的先验的道德规

范，从而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许多反动统治者以及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利用这种唯心主义的修养经作为维护其反动统治或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刘少奇就曾在他的黑《修养》中公开贩卖“慎独”的反动货色。

## 内 省

儒家提倡的唯心主义修养方法。意为内心的反省。孔丘说：“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是说一个人所作所为，内省于心，自觉无愧，就没有什么可以忧虑、害怕的。这种脱离客观实际、脱离社会实践、只注意内心省察的闭门修养方法，在认识论上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而作为内心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只能是儒家鼓吹的奴隶主阶级的道德规范，因而在政治上是维护反动统治阶级利益的。

## 正 心 诚 意

儒家提倡的唯心主义的内心道德修养方法。《礼记·大学》：“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正心诚意即教人发挥意念中先天固有的善心，用“求于内”的内省方法，自觉服从奴隶主的道德约束。儒家认为这样才符合统治阶级的修养标准，才能“治人”，为维护奴隶制度服务。

## 孟 轲

孟轲（约公元前390——前305年），山东邹县人，

孔丘之后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孔家店的二老板。孟轲生活在封建制在各诸侯国已经或正在建立的战国中期，顽固地站在没落奴隶主贵族的立场，疯狂攻击法家的法治路线，反对新建立的封建制度，妄图开历史倒车。他打出“法先王”的旗号，宣扬奴隶主阶级的“仁政”、“王道”，鼓吹所谓“仁义”，反对新兴地主阶级的革命暴力；攻击法家的耕战政策，要求恢复奴隶制的井田制和奴隶主贵族的世卿世禄制度。为了给复辟奴隶制的反动政治路线制造理论根据，他大肆鼓吹“万物皆备于我”的主观唯心论，天生“性善”的人性论，“先知先觉”的唯心论先验论以及“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英雄史观和历史循环论；还提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反动思想，把奴隶主对奴隶的剥削和压迫说成是“天下之通义”。孟轲的反动言行，主要收集在《孟子》一书中。后世儒家门徒把孟轲吹捧为仅次于孔丘的“亚圣”，因而儒家的反动思想也被称为孔孟之道。

## 《孟 子》

战国中期没落奴隶主阶级代言人孟轲的反动言论集，是他的学生纂集的，全书共七篇。《孟子》继承和发挥了孔丘的“仁”的思想，提出欺骗性极大的“仁政”说，以反对新兴地主阶级的革命暴力，复辟奴隶主阶级专政。它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极力鼓吹恢复已经崩溃了的奴隶制的井田制。它强调“为政不难，不

得罪于巨室”，公开反对取消奴隶主贵族的特权。为了给复辟奴隶制制造理论根据，书中提出了反动倒退的历史观，认为春秋时的“五霸”不如奴隶社会的“三王”，而当今的诸侯又不如春秋时的“五霸”，当今的大夫又不如诸侯，总之今不如昔，应当开历史的倒车。书中还大肆宣扬了“万物皆备于我”的主观唯心论，天生“性善”的人性论，“不虑而知”、“先知先觉”、“天降之才”的唯心论先验论、天才论以及“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英雄史观。《孟子》一书，流传广，影响深，在历史上起了极为反动的作用，完全是为复辟倒退路线服务的。南宋反动理学家朱熹把它列为《四书》之一，成为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必读的“经典”。

## 道 统

指儒家所谓传“道”的系统。孟轲以孔丘学说的正统继承人自居，并把儒家人物加以美化，在他们之间虚构了一种前后相承的关系，宣扬奴隶主阶级的“道统”，以反对法家为代表的新兴地主阶级在政治思想领域的革命。唐代韩愈发挥了孟轲的思想，提出了适应地主阶级顽固派需要的“道统”说，论证孔孟之道是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借以维护孔孟之道的思想统治，对抗法家的革新思想。宋代程颢、程颐、朱熹等也都宣扬“道统”说，自称是孔孟之道的直接继承者，要求“辨异端，辟邪说”，就是妄图反对农民的革命思想，抵制法家的革

新思想。儒家的所谓“道统”，实际上是孔学的一条黑线，是适应历代反动统治者的需要而形成的。

## 先知先觉

孟轲鼓吹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和天才论。他把自己说成是天生就懂得“道”的超人，狂叫什么“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俨然以救世主、天生的教育者和统治者自居。相反，劳动人民则被诬蔑为“后知后觉”的群氓，天生注定要受“先知先觉”，即反动统治阶级的摆布。林彪叫嚷“先知先觉是有的”，和孟轲一样，是为自己篡党夺权的反革命复辟活动制造舆论。

## 良知良能

孟轲宣扬的唯心主义先验论。他说什么“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良，生来就有的；知，知识；能，才能。这种良知良能的谬论是建立在超阶级人性论的基础之上的。孟轲胡说人生下来就有所谓“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这就是良知良能的表现。这种良知良能，既不用通过后天的学习，又不用接触外界的事物，只要反省内求，就可以发挥出来，从而使自己的行动符合奴隶主阶级的道德规范。孟轲妄图用这种反动说教，为复辟奴隶制的政治路线服务。

## 性 善 论

孟轲提出的一种反动的人性论。孟轲说的善就是所谓“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也就是“仁义礼智”四种道德纲常。孟轲胡说这种“善”性不是社会存在反映到人的头脑中来的，而是“我固有之也”，即人的本性中天生就有的。他说人性皆“善”，表面看来好象是人人一样，其实是有阶级性的。他说“善”性是“庶民去之，君子有之”，只有奴隶主阶级才能保持它，发展它，劳动人民则保持不住它，要丧失它。这种“性善论”，就成为奴隶主贵族和上层分子具有先天优越性的根据，并由此得出：脑力劳动者是统治人的，体力劳动者是被人管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反动政治结论。由于“性善论”掩盖了剥削阶级的丑恶面貌，能够麻痹劳动人民的革命斗志，它对反动统治者是有利的。因此，历代统治阶级都竭力提倡。

## 仁 政

孟轲复辟奴隶制度的政治主张。孟轲发挥了孔丘“仁”的思想，提出“仁政”的政治纲领，同法家主张的“法治”相对抗。“仁政”的内容，首先是“正经界”，在经济上恢复殷周社会的“井田制”，即奴隶主所有制。其次，他提出要“分田制禄”，恢复奴隶制的

授田方式，实际上是要对新兴地主阶级进行反攻倒算，在政治上恢复奴隶主贵族的“世卿世禄”制度，让奴隶主贵族重新上台。“仁政”的又一个重要内容，是排斥功利，鼓吹所谓“仁义”。孟轲拚命反对法家的法治路线和耕战政策，反对新兴地主阶级使用革命暴力，反对为实现全国统一所进行的进步战争。所谓“仁政”，实质就是奴隶主阶级专政。历代的反动统治阶级，都把“仁政”作为掩饰其暴政的遮羞布。被推翻的反动阶级为了实现他们的复辟希望，总是攻击新兴的革命阶级不实行“仁政”。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阶级敌人叫嚷要实行“仁政”，其实就是要复辟资本主义。毛主席说：“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

## 王道和霸道

“王道”指实行“仁政”的先王之道，是孟轲首先提出并为历来儒家所鼓吹的政治路线，其中心内容是以所谓仁义道德治理天下。他们把所谓“以德服人”说成是“王道”，把所谓“以力服人”说成是“霸道”。实际上，“王道”和“霸道”是历代反动统治者压迫剥削人民的反革命两手，“霸道”是赤裸裸的反革命专政，“王道”是给反革命专政披上一层“仁政”的外衣。正如鲁迅指出的：“在中国的王道，看去虽然好象是和霸道对立的东西，其实都是兄弟，这之前和之后，一定有



霸道跑来的。”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标榜“王道”，反对“霸道”，是为了掩盖奴隶主阶级的凶恶面目，反对奴隶起义和新兴地主阶级的革命暴力。林彪拣起孟轲的“王道”的破旗，叫嚷什么“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其罪恶目的正是用儒家的语言，恶毒攻击无产阶级的革命暴力，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 道 家

春秋战国时期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一个反动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是老聃和庄周。他们认为“道”是宇宙的本体，是天地万物的根源，因此后人把这一学派称为“道家”。道家的思想体系是唯心主义的，他们所宣扬的“道”不是物质实体，而是“虚无”的超时空的绝对精神或主体精神。在认识论上，他们鼓吹唯心论的先验论和神秘的直觉主义。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即用消极退守的办法来抵制新兴地主阶级的变法革新，以挽救奴隶制的灭亡。道家反对社会变革和进步，主张复古，使社会回到奴隶制或原始社会去。道家代表作《老子》的思想体系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但含有丰富的辩证法因素。历史上有些进步思想家都注意从中吸取有益的思想资料。庄周在思想上则更加走向相对主义、不可知论和诡辩论，政治上更加反动和没落。历史上的反动统治阶级都利用这种反动思想来为他们的腐朽寄生生活作辩护，并以此作为麻痹人民斗志的思想武器。

## 老 庄 学 派

即以老聃和庄周学说为代表的道学学派。从战国时期到秦汉之际，老庄并未被作为一个学派。到西汉末，出现了兼治老、庄的学者。至魏晋何晏、王弼等人那时，才形成了正式的老庄学派。

### 老 聃

又名李耳，生卒年不详，战国时楚国人，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老子》（又名《道德经》），是研究老聃（dān 音丹）思想的主要材料。老聃的哲学体系是客观唯心主义的。他宣扬所谓“道”，把“道”说成是“先天地生”，又“可以为天下母”的，即是认为天地万物是由虚无的“道”产生的，这是极端的客观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在认识论上，他主张“不出户，知天下”，还说“圣人”可以“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根本否定感觉和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他还反对求学问，提出要“绝学”、“弃智”，根本否定人们有获得知识的必要，为统治者推行愚民政策制造理论根据。在政治上，他主张“无为而治”，反对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家路线和耕战政策，把“小国寡民”作为理想的社会图景，其实是要倒退到奴隶制或原始社会的闭塞落后状态。在发展观上，他提出“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正复为奇，善复为妖”，

臆测出事物总是向着它的对立面转化。这表明在老聃的哲学中具有一些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但他把矛盾运动看成是相对的，把统一、静止看成是绝对的，并且把对立面的转化看成是无条件的，把运动看成是循环往复的过程，终于落入形而上学、循环论的泥坑。这是和他的反动立场以及唯心主义世界观分不开的。

## 《道德经》

即《老子》，春秋以来道家学派的代表作。相传为春秋晚期哲学家老聃作，实际成书于战国时代。基本上保留了老聃的主要思想。全书分上下两篇，汉以来均以“道”经为上篇，“德”经为下篇，通称《道德经》。根据长沙马王堆汉墓发现的《老子》帛书，则“德”经在前，“道”经在后，似应称为《德道经》。《道德经》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的大变动，从哲学上概括了当时政治斗争尤其是军事斗争的规律，含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它比较系统地揭示了事物存在的相互依存和对立统一关系；指出了事物发展到顶点就要向反面转化的客观规律。

但是《道德经》的作者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表，它把军事、政治斗争规律统统囊括到虚无缥缈的“道”中。“道”和“物”的关系是“道”在“物”先，这是主张精神是第一性的，物质是第二性的。因此其整个体系是客观唯心主义的。它不懂得矛盾的转化需要一定的

条件，妄图使已经“软弱”了的奴隶主阶级转化成为“刚强”，鼓吹倒退到“小国寡民”的奴隶时代。它不区分战争的性质而反对一切战争，站在法家的对立面。它的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最终为其唯心主义体系所窒息。后来有些封建统治者重视《道德经》中的道家思想，利用其中“将欲夺之必固与之”的统治权术，和“常使民无知无欲”的愚民政策等反动糟粕，用来统治人民。所有这些，都说明了老聃思想的反动性。

## 无 为

道家的哲学思想。意思是不要有所作为而听任自然变化。老聃讲“天道无为”和“道法自然”，他把“道”作为世界的本原，而“道”是自然的、没有目的、没有意图的，“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他让人效法“道”，以“无为”来达到“有为”。这种哲学思想表现在政治上，就是“无为而治”。老聃的“无为而治”的思想，反映了春秋末期没落的奴隶主阶级消极绝望的心情。对于道家的“无为”思想，儒家和法家都曾加以改造和利用。西汉初期法家代表人物提倡“无为”，如汉文帝“其治为清静无为”，是适应当时地主阶级为巩固其政权而要求局势稳定的客观需要。

## 庄 周

庄周（约公元前369——前286年），宋国人，战国

时代道家代表人物。他曾做过管理漆园的小官，属于破落的中小奴隶主阶级。他认为主观精神的“道”是万事万物的本原，鼓吹“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从主观唯心主义出发，他认为现实世界的一切都是虚无的。他片面夸大事物的尺寸、死生、贵贱等的相对性的一面，鼓吹绝对的相对主义，抹杀事物的质的区别，根本否认有客观真理并进而否认客观事物的存在，走向不可知论和极端怀疑主义。实质上，他是以相对主义抹杀封建制和奴隶制的质的区别，否定新的封建制生产关系的合理性和进步性。庄周的社会政治思想极其反动，认为“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为奴隶制的灭亡感到无限悲哀。他提出“坐忘”，让人们忘掉一切，在听天由命中去追求所谓精神自由。在文化观上，他否定一切文化知识，反对生产技术进步，主张使人民无知无识，倒退到“同与禽兽居”的原始状态。庄周的思想反映了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消极对抗态度和绝望厌世情绪，对以后的没落阶级很有影响，当时以及后来的进步思想家都对他作过批判。

## 《庄 子》

也叫《南华经》。是春秋战国时期一个反动学派道家的经典之一。《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庄子》五十二篇，但留下来的只有三十三篇。其中内篇七篇，一般认定为庄周著；外、杂篇可能掺杂有他的门徒和后来道

家的作品。是研究庄周及其学派哲学思想的主要资料。

## 为 我

战国时哲学家杨朱(约公元前395——前335年)的政治伦理思想。他反对儒家的虚伪道德说教，也反对墨家的“兼爱”说，主张“为我”，“贵己”。说什么“贵莫于生”，活命是最高原则。因此，人应当“轻物重生”，不要因为物质享受而损害身体。这种极端利己主义的活命哲学，代表了奴隶主阶级在社会大变革中逃避现实，保全自己的自私绝望心理。

## 形 神

中国古代哲学的一对范畴，形指物质形体、人的身体等；神指精神、灵魂等。唯心主义思想家和宗教神学家鼓吹“神”是第一性的，“形”是第二性的。如庄周说：“精神生于道，形本生于精”。认为形体是从精神产生的，而人的精神又是“道”（客体精神）产生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则认为有了形体才有精神，如荀况认为“形具而神生，好恶喜怒哀乐藏焉”。东汉唯物主义者桓谭、王充等，以烛火关系比喻形神关系，烛烧完了，火光就灭了，形体死亡，精神也就不再存在。肯定了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原则，打击了当时流行的谶纬神学。南北朝时期，形神问题成了反佛斗争的中心，唯物主义思想家范缜以他著名的《神灭论》，论证“形者神之质(实

体），神者形之用（作用）”，“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驳斥佛教认为人的灵魂不灭的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等迷信思想。

## 兵 家

春秋战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的军事思想家，法家的同盟军。主要代表人物有孙武、吴起、孙臆等。他们主张以新兴地主阶级的统一战争去消灭奴隶主阶级分裂割据的战争；用战争推翻奴隶制，建立封建制。在战争观上，兵家针对儒家“去食去兵”，鼓吹奴隶主阶级的“仁义之师”，叫嚷“善战者服上刑”等论调，提出战争不可避免的论点，主张“举兵强之”，即用战争解决问题。在军事路线上，兵家主张以法治军，反对儒家的“以礼治军”。兵家还驳斥了儒家“小国师大国”的投降主义谬论，以及“弱国不可以敌强”的形而上学军事观点，提出“弱生于强”，“强弱，形也”的以弱胜强战略思想。兵家的军事著作富有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但是兵家究竟是剥削阶级的军事家，不可能认识到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决定作用，认为战争的胜败决定于将帅的才能，陷入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他们没有将用兵之道上升到政治斗争的战略和策略，更没有提出一条为新兴地主阶级服务的政治路线。因此，在反儒斗争中只能对法家起配合作用。

## 孙武及《孙子兵法》

孙武，春秋末期齐国人，兵家代表人物，曾以所著兵法求见吴王阖闾，被任命为将，大破楚国。孙武主张以法治军，“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就是说，必须法令严明，军纪整饬，才能成为取胜之军。他深知战争的多变性，认为战争的规律可以被人认识。他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认为强弱、众寡、胜败等矛盾对立的双方可以转化，要求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力争掌握战争的主动权。他著的《孙子兵法》一书，是春秋时代战争经验的总结，是新兴地主阶级军事思想的结晶，为后代军事家所重视，曹操等曾为之作注。

## 孙臆及《孙臆兵法》

孙臆（约公元前380—前320年），齐国人，孙武的后代，战国时新兴地主阶级的军事家。曾辅佐魏惠王，被魏将庞涓陷害受臆刑（去掉膝盖骨），后逃回齐国，做了齐威王的军师。先后在桂陵和马陵打败魏军，诱杀庞涓。公元前335年孙臆“围魏救赵”、大败魏军的战役，是体现兵家“因敌变化而取胜”的军事思想的有名战例。

所著《孙臆兵法》失传了一千七百多年，一九七二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出土了八篇，其中反映了新



兴地主阶级通过战争达到统一的政治要求和军事思想，富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

## 名 家

原称“辩者”，汉朝改称名家，是战国时期以辩名实关系问题为中心的一个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惠施、公孙龙。名实关系问题，即指概念与事实的关系问题，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一个重要内容。当时，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新旧事物交替，旧的“名”已不能适应新的“实”，儒家提出“正名论”，妄图通过“正名”来维护旧制度。名家则主张“名”要随“实”的发展变化而变化，从而肯定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社会变革，为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进行了辩护。惠施在他的“合同异”主张中，强调事物的差异，反对夸大事物的同一性；公孙龙着重于分析感觉和揭露概念的矛盾，强调事物的差别性。他们提出许多与旧传统观念截然相反的命题，具有唯物主义因素和朴素辩证法思想。名家基本上是反对儒家，支持法家的，是法家的同盟军。但名家思想中也有不少消极的成分。他们反儒不彻底。在哲学思想上，名家也有严重的局限，有些观点陷入了唯心主义。

## 惠 施

惠施(约公元前370——前310年)，先秦名家代表，战国时宋国人，以“善辩”著名。惠施曾为魏国制订法

律，主张“信赏必罚”，可见他在政治上是支持地主阶级的法治的。在哲学上，惠施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对先秦名学（逻辑学）的发展有所贡献。他提出“合同异”，认为万物都是有联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万物“毕同”；然而万物又是相互区别的，万物“毕异”。他的“至小无内，谓之小一”的命题，认为世界是由微小的粒子组成，这比五行说在物质观上是个进步。但他不承认物质的无限可分性，是错误的。他还认为事物的大小、高低、长短、黑白等矛盾，失去一方他方也不存在。并且认为一切事物都处于运动、变化之中，“天与地卑，山与泽平”，天、地、山、泽都不是固定不变的。他把事物看作是相对的、变动的，这实际上是不承认奴隶制是绝对的、永恒的，为法家主张变革和封建制代替奴隶制提供了理论根据。惠施赞同墨家“兼爱”、“非攻”思想，这在当时是一种消极的主张。他的著作已全部散失，在《庄子》中保留了一部分；在《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中也有他的言行的片断记载。

## 公 孙 龙

公孙龙(约公元前320—前250年)，先秦名家主要代表，战国时赵国人，曾为赵平原君门客，善于辩论。他适应新兴地主阶级肯定社会变革的要求，提出“审其事实，慎其所谓”，即根据新的“实”来慎重地重新定

名。他认为“名，实谓也”，名是用来称呼实的，概念是用来反映具体事物的。他的“正名实”而以“实”为标准的论点，反对了儒家要改变已发展的事物来适合原来旧概念的反动的“正名”论，支持了法家。公孙龙的著名辩题有“离坚白”，“白马非马”等多条。认为石头的“坚”和“白”两种属性是可以分离的；“白马”和“马”，存在特殊和一般的差别，是不同的“名”（概念），不应混淆。他着重分析了概念的规定性和差别性，对我国古代逻辑学的发展，有一定的贡献。但他过分夸大了这些差别性，而看不到概念反映事物的具体同一性，不免陷入形而上学。代表公孙龙思想的著作有《公孙龙子》。

## 《墨 经》

亦称《墨辩》，是《墨子》一书中的重要部分，包括《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等六篇，它是后期墨家的著作，可能形成于战国后期。《墨经》在政治上提倡法治，发展了前期墨家关于“尚同”的思想，有利于封建专制集权的巩固，是法家的同盟军。在社会伦理道德方面，提倡功利思想，公开声明道德行为不能离开功利，打击了儒家超功利的伪善说教。《墨经》对前期墨家的哲学思想，作了积极的发展，概括了墨家关于认识论、逻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在认识论方面，提出“察名实”，认为

名词概念必须反映客观事物内容，坚持了由实到名的正确路线。在反对儒家唯心论先验论的斗争中，进一步研究了认识的起源和认识的过程，强调了认识必须来源于客观事物，坚持了唯物主义路线。但仍然有经验论的缺陷。《墨经》在反对儒家和诡辩论的斗争中，对概念、判断、推理也作了研究和说明，提出了比较系统的逻辑思想，对我国古代逻辑理论作出了贡献。

## 荀 况

荀况（约公元前313——前238年），又称荀卿或孙卿，赵国人。战国时期杰出的法家代表人物，唯物主义思想家。荀况早期虽名义上属儒家，但后来他背离了奴隶主阶级立场，对儒家正宗的思孟学派进行了尖锐的抨击，因此从思想实质上看，他是属于法家阵营的杰出思想家。

在政治思想上，荀况主张法治，反对礼治。他批判孔丘“吾从周”，孟轲“法先王”的复辟倒退思想，提出“法后王”的政治主张，让各国以新兴的地主阶级专政国家的秦国为师。他提倡“农分田而耕”的封建生产方式，反对恢复奴隶制生产方式的“井田制”。他还第一次提出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制国家问题，为法家政治路线增添了新内容。

荀况为了提倡法治，必然与所谓儒家正宗的思孟学派发生尖锐冲突。他批判孟轲的“性善论”而提出“性

恶论”的观点。他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合乎社会道德的“善”，乃是学习和实践的结果。同时，他把矛头指向儒家的“天命论”，认为“天行有常”，自然界有它自己运行的客观规律，同人的吉凶祸福没有必然联系。他并且提出“制天命”的人定胜天思想，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奋发有为的精神。

荀况的思想体系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但他的思想也有阶级局限性，如他的“性恶论”，离开人的阶级性抽象地谈人性善恶，仍是唯心主义的；他认为“天地始者，今日是也”，说天地开辟以来和今天的状况是一样的，有着形而上学的历史循环论色彩。

## 《荀子》

战国末期杰出法家荀况的著作，全书共三十二篇。书中总结和发展了前期法家思想，对儒家尤其是对孟轲进行了严肃的批判。《荀子》发挥了反对礼治、主张法治的思想，宣扬了新兴地主阶级统一中国的思想；提出“法后王”的鲜明口号，积极鼓吹法家政治路线。在《天论》篇中，集中地发挥了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用“天人相分”的唯物主义观点批判思孟学派“天人合一”的唯心主义观点，并进一步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胜天的光辉思想。此外，《荀子》一书还阐述了关于教育、文学、军事、水利等方面的思想。《荀子》是富有战斗性的著作，它为法家路线在理论上奠定了基础，为

新兴地主阶级夺取全国政权作了舆论准备。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书中把封建帝王的统治和封建等级制度说成是天经地义的，仍是历史唯心主义观点。

## 天 人 相 分

法家荀况针对儒家“天人合一”而提出的唯物主义思想。《荀子·天论》说：“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圣人矣”，即是要求人们判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活动的区别。荀况认为天是没有意志的自然界，“天行有常”，有它自己的规律，天是不能危害人的，人间的吉凶、治乱、祸福取决于人们自己，和天没有关系。天人相分思想，引导人们从天命论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为法家的政治路线奠定了哲学基础；同时，也是对儒家“天人合一”的唯心主义观点进行的有力批判。

## 性 恶 论

战国末期法家荀况提出的一种地主阶级的人性论，和孟轲的“性善论”相对立。荀况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善”是经过后天改造的结果。荀况不承认奴隶主阶级的人性是“善”的，“君子与小人，其性一也”，人性“好利而恶害”，就是说高贵者和卑贱者的自然本性是一样的，都是“恶”的，这就揭露了奴隶主阶级的本性，撕下了他们伪善的面纱。在“性恶论”的基础上，荀况进一步提出“立君臣上下之势以临之”，“重

刑罚以禁之”，才能化“恶”为“善”，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法治”提供理论根据。“性恶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性恶论”也是一种抽象的超阶级的人性论，它离开人的阶级性，把人性说成普遍是恶的，并没有摆脱天赋道德的观念，因而它仍然是一种唯心主义观点。

## 韩 非

韩非(约公元前280——前233年)，战国末期韩国人，唯物主义哲学家，先秦法家思想集大成者，著有《韩非子》五十五篇。韩非总结了以前法家的理论和实践经验，适应当时为进一步发展封建经济而要求建立全国统一政权的历史趋势，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法家思想体系。他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即不迷信古代，积极变革现状。为此，他明确提出“以法为本”，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对于巩固中央集权，防止钻入封建国家政权内部的敌人篡权复辟，具有重要的意义。韩非继承了前期法家重视耕战的理论和政策，强调“富国以农，距敌恃卒”。他把战国时代概括为“争于气力”的时代，主张“明君务力”，为新兴地主阶级进行进步的统一战争制造了舆论。韩非指出“儒以文乱法”，认为儒法两家有“不可两存之仇”。他对孔孟的反动思想和仁义道德的说教，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提出要“废先王之教”，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

师”，对于那些破坏法治的儒生，要“禁其行”，“破其群”，“散其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对奴隶主阶级实行地主阶级专政。韩非反对儒家的“天命”论和唯心论先验论，反对儒家的复古思想，主张“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是个厚今薄古的思想家。但韩非鄙视劳动人民，主张对劳动人民实行高压政策，把变革的希望寄托在君主身上，认为历史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新圣”所创造。充分显示了他的地主阶级的阶级性。

## 《韩非子》

战国末期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韩非的著作，全书五十五篇，大部分是韩非本人的作品，其中《五蠹》、《孤愤》、《显学》、《说难》、《定法》等篇反映了韩非的主要思想。《韩非子》宣扬法家的进化历史观，批判了儒家“法先王”的复古倒退思想。系统地反映了韩非的法治理论，总结了以往法家的经验，主张法、术、势相结合，把法家思想发展到新的高度。他还发展了“耕战”思想，主张通过革命暴力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书中深刻揭露“儒以文乱法”，把空谈仁义、不务耕战的儒家看成是必须除掉的社会蛀虫。在法家学派的著作中，《韩非子》最早指名批判了孔丘，并指出在中央集权的地主阶级政权建立以后，必须警惕钻进封建国家机器内部的奴隶主贵族野心家这一阶级斗争的



新特点。他还发挥了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的思想，否定天命与鬼神，主张崇尚人力。并提出人的认识是否正确，要以行动的实效作为检验的标准。《韩非子》集中体现了新兴地主阶级坚持前进，坚持变革的政治思想，对秦始皇建立和巩固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起了重要的作用。

## 法、术、势

战国末期法家韩非的“法治”理论的基本内容。韩非从新兴地主阶级反复辟斗争的政治需要出发，总结了前期法家商鞅之“法”，申不害之“术”，慎到之“势”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

“法”，指的是运用体现新兴地主阶级意志的政策、法令来进行统治，打击奴隶主阶级的政治势力，建立和巩固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术”，指根据法治路线进行斗争的策略，包括任免、考核、赏罚各级官吏的方法和手段，特别要同钻入到政权内部的敌人进行斗争。“势”，指的是要加强君主的地位和权力，保证封建法权的贯彻，反对分封制，以避免奴隶主贵族复辟的危险。韩非认为法、术、势这三者缺一不可，法是根本，术和势是保证法的实施的不可少的条件。韩非的法、术、势相结合的理论，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中央集权的地主阶级专政的国家奠定了理论基础。

## 《礼 记》

也叫《小戴记》或《小戴礼记》，是儒家的一部反动著作，先秦至汉初儒家关于“礼”的论述的汇编。有《曲礼》、《礼运》、《中庸》、《大学》等四十九篇，相传是西汉戴圣编纂。被列入儒家经典“十三经”中。《礼记》中说：“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即是说天地之理不变，“礼”也永恒不变。从这个观点出发，它集中鼓吹复辟“周礼”，即恢复奴隶制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它鼓吹“为政先礼，礼其政之本与”，把“礼治”说成是统治者必须牢牢抓住的“治人”的根本。它毫不隐讳地宣称：“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说明“礼”就是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工具。它还宣扬天命、中庸之道、人性论等谬论，为历代反动派所推崇。蒋介石称“礼记”的反动说教是“为政的基本要道”，“永远不变的原则”。叛徒、卖国贼林彪也无耻吹捧《礼记》，胡说“儒家的德、仁义、忠恕来源于《礼记》”，“是处理人事关系的准则”，充分暴露了他“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用心。

## 《仪 礼》

简称《礼》，也叫《礼经》，共十七篇。儒家宣传它是周公或孔子所作，实际上是战国时期儒家的作品，它是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提倡的典礼制度的汇编，也被列

入儒家经典“十三经”中。

## 杂 家

战国末期到汉初对各家思想进行折中、糅合（所谓“兼儒墨，合名法”）的一个学派。杂家的代表著作有吕不韦主持编纂的《吕氏春秋》和西汉淮南王刘安主持编纂的《淮南子》。这一学派虽以杂家自命，实际上是以儒家或道家为中心思想的。例如：秦汉之际，法家居于统治地位，儒家遭到严厉打击，没落奴隶主阶级中的某些人不敢再公开打出儒家旗号，便在杂家的幌子下贩卖儒家的黑货，向法家反扑。《吕氏春秋》就是这样一部作品。

## 农 家

战国时期反映农民思想的学派，代表人物姓名失传。《孟子》中载有许行其人，主张“与民并耕而食，饗殮而治”，反映了古代社会中农民的一种理想。农家还总结了农业生产的技术经验，如《管子》、《吕氏春秋》等书中都掺杂有一些可能是农家的著作，论述了气候、土壤、耕耘、施肥、保墒等有关农业生产发展问题，反映了战国时期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在政治上，农家鼓吹以农为本而以工商业为末的“重农”政策，这是适应新兴地主阶级发展农业生产的需要的，并和某些法家的耕战政策有类

似之点。

## 阴 阳 家

战国时期阴阳五行说的一个学派，又称阴阳五行家，以齐国人邹衍为代表。阴阳说和五行说本来是商周时期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因素的两种流行思想。阴阳说认为物质由阴阳二气构成；五行说认为物质由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构成。以邹衍为首的阴阳家，为了适应奴隶主阶级复辟活动的需要，把它神秘化，把阴阳和五行结合起来，在上面冠以人格神的“天”，鼓吹阴阳五行是受天支配的。同时，他们把五行的属性称为五德，用“五行相胜”（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木胜土，土又胜水）来比附历史上王朝兴替，虚构了一个“五德终始”的历史循环论体系，妄图证明奴隶制的灭亡是暂时的，将来还是要恢复到奴隶社会。阴阳说还制造“符应”说，说统治者的行动会感动上天，使自然界出现一些祥瑞和灾异的现象。阴阳家是为没落奴隶主阶级服务的，是儒家的同盟军。西汉时期，阴阳家与儒家合流，形成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和谶纬神学。后来的反动统治者也利用阴阳家的思想来维护自己的统治。

## 纵 横 家

战国时期从事政治外交活动的谋略家，以苏秦、张仪为主要代表。在战国中期和后期，从诸侯割据走向统

一的尖锐复杂斗争中，纵横家游说各国君主，提出“合纵”（“合众弱以攻一强”，如苏秦联合六国以抗拒秦国）；“连横”（“事一强以攻众弱”，如张仪为秦国去对各国分化瓦解，各个击破，从而消灭六国）。纵横家的名称，就是由此而来。纵横家没有明确的哲学思想体系，也没有一致的政治路线。他们各自的服务对象不同，因而各自的政治主张也不同。对于纵横家的事业和作用，必须作具体分析。如张仪为秦国采取“连横”策略，有助于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王朝的建立，成为法家的同盟军。而苏秦为反抗秦国统一中国采用“合纵”策略，则使他成为儒家的同盟军。

### 三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此后，我国封建社会经历了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

秦末爆发了陈胜、吴广大起义，推翻了秦朝，为汉初进一步巩固封建制度开辟了道路。

在两汉时代，确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西汉前期，处在上升时期的地主阶级，继续推行法家路线来打击奴隶制复辟势力。西汉后期，封建制度得到巩固，奴隶制复辟的严重危险已经过去，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日益尖锐。地主阶级随着历史地位的变化，由尊法转为尊儒，大肆提倡经董仲舒改造的孔孟儒学，主要是“天人感应”神学体系和“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永恒天命观念，作为麻痹、瓦解广大农民斗争意志的精神武器。到了东汉，董仲舒改造过的儒学同谶纬神学合流，正式成为官方哲学。

这个时期起来反对从孔、孟到董仲舒的儒学和谶纬神学的，有坚持反对阴阳灾异说的唯物论和明“时世之变”的历史观的桑弘羊，有坚持唯物论、反对谶纬神学的桓谭，有坚持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对谶纬迷信进行

坚决斗争的王充等人。

## 陈胜、吴广起义

秦末陈胜、吴广领导的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发生在公元前209年。秦始皇去世后，潜伏在秦政权内部的野心家赵高乘机篡权，改变了秦始皇的法家路线，推行复辟倒退的儒家路线，对劳动人民实行奴隶主式的残酷压榨，使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进一步激化起来，导致了陈胜、吴广大起义。这是一次大规模的反封建斗争，它推翻了秦朝，建立了“张楚”政权，粉碎了赵高复辟奴隶制的阴谋。在起义过程中，陈胜响亮地提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意思是说：王侯将相这些统治阶级人物难道都是天生的贵种，命中注定由他们来统治人民吗？陈胜还断然拒绝和驳斥了孔丘八世孙、反动儒生孔鲋要他“兴灭国，继绝世”的反动说教。这些言论行动，是对孔孟之道所鼓吹的反动血统论和天命论的有力批判，表现了劳动人民敢于蔑视权贵，自己起来掌握政权的决心和气魄。

## 董仲舒

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年），广川（今河北省景县董故庄）人，西汉“大儒”，两汉时期封建统治阶级尊儒反法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汉景帝时曾任博士

官。武帝即位后，上贤良对策，提出“罢黜百家，尊崇儒术”的建议。由于其思想迎合了地主阶级保守派的要求，并适应封建统治者欺骗人民的需要，自汉元帝以后，他的主张得以逐步实现，主要著作有《春秋繁露》。

董仲舒鼓吹“奉天法古”，贩卖历史倒退论。为了推行他的复辟倒退路线，提出了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宇宙观，为封建统治的永恒性制造理论根据。毛主席指出：“在中国，则有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曾经长期地为腐朽了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董仲舒继承和发挥了殷周以来的天命思想，特别是儒家思孟学派神秘主义的“天人合一”观点，建立了一套“天人感应”的神学唯心主义体系。胡说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天”有目的地安排的，天人可以互相感应，人如果顺天意，天就高兴，就降祥瑞；如违背天意，天就愤怒，就降下灾异。鼓吹“王权神授”论，认为封建皇帝的统治权力是上天授予的。还提出“三纲五常”的反动说教，为巩固封建统治秩序制造理论根据，并把它说成是天的意志，成为后来中国长期封建社会束缚人民特别是农民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大绳索。由于他鼓吹的反对变革、维护旧秩序的反动理论适合封建地主阶级顽固派的需要，所以受到历代反动派的吹捧。林彪叫嚣“希望大家都当董仲舒”，充分暴露了他妄图利用孔孟之道对抗马克思主义、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狼子野心。



## 《春秋繁露》

董仲舒的主要著作，全书共十七卷。它发挥了孔孟的天命论，宣扬“天人感应论”，说人世间的一切，都是老天爷有目的地安排，不能违抗；鼓吹“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宇宙观，胡说地主压榨农民，农民受地主压榨，这都是“天道”。兜售反动的地主阶级人性论，鼓吹“性三品”说，为封建地主阶级进行统治制造理论根据。书中提出的“三纲五常”反动思想，是封建社会长期束缚广大人民的极大的绳索。

### 神学目的论

董仲舒建立的一套解释“王权神授”的反动学说。他把“天”说成是超自然的有意志的“神”，把人世间的一切包括封建王权的统治都说成是上天的意志，是上天有目的地安排，从而把天上的神权和地下的王权沟通起来，为“王权神授”制造理论根据。同时，他还把儒家伦理道德同神学目的论联系起来，把儒家学说宗教化、神学化。

### 三纲五常

由董仲舒提出，并经后来的反动统治阶级代表人物加以系统化的一套反动封建教条。“三纲”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意思是臣要绝对服从

君，子要绝对服从父，妻要绝对服从夫。“五常”指“仁、义、礼、智、信”五条封建道德伦理规范，是实行“三纲”的具体要求。董仲舒把“三纲”说成是天意规定的，并把“五常”与金、木、水、火、土五行相比附，从而赋予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和儒家人伦道德学说以神学上的根据。历代反动统治阶级都把“三纲五常”作为束缚人民思想，维护反动统治的思想武器。毛主席指出：在旧中国“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由董仲舒开始炮制的“三纲五常”，就是维护这四种反动权力的。林彪之流胡说“三纲五常”是“极高的美德”，妄图用来为其篡党夺权，建立封建法西斯王朝服务。

### 性三品说

一种反动的地主阶级人性论。董仲舒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等：上等的“圣人之性”，是天生“善”的，“圣人”是当然的统治者；中等的“中民之性”，可以用地主阶级的“仁义道德”进行教育，使之变为“善”的；下等的“斗筲之性”是劳动人民的，天生愚笨，劳动人民只能受“圣人”的统治。这种“性三品”说，同孔老二的“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反动谬论一脉相承，为封建地主阶级统治劳动人民制造理论根据。唐代韩愈继承和发挥了董仲舒的“性三品”说，提出“上之性就

学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竭力鼓吹上品和下品的人性都是不能改变的，对“下之性”的劳动人民，只能靠“威”来镇压，迫使劳动人民服从地主阶级的统治。

## 伦 常

封建社会里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称为人伦。反动儒家和封建统治者把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的封建关系和秩序称为“五伦”，并妄称这是永恒的、不可改变的常道，所以又称为伦常。

## 三 统 三 正

董仲舒宣扬的一种反动的唯心主义历史循环论。他胡诌一通，说什么夏、商、周三代的区别，只是崇尚的服色和采用的历法不同。在服色上，夏朝尚黄是黄统，商朝尚白是白统，周朝尚赤是赤统，这就是所谓“三统”。在历法上，夏朝以寅月（即农历正月）为正月，商朝以丑月（即农历十二月）为正月，周朝以子月（即农历十一月）为正月，这就是所谓“三正”。董仲舒硬说，历史上的改朝换代不过是“三统”的依次循环，因而一个王朝出现，就要改变一下历法，更换一下衣服旗号的颜色，表明重新受了“天命”来统治人民。至于封建统治的根本秩序——“道”则是不用也不能改变的，即所谓“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三统三正”论，

表明了反动儒家复古倒退的唯心主义历史观。

## 天人感应

董仲舒继承和发挥儒家思孟学派“天人合一”思想而创造的一种唯心主义神学理论。他不但把“天”说成能够有目的地安排人事，而且对人世间的一切活动，“天”也会有所反应，编造出什么人世上如发生违背天道的坏事情，“天”就要发出灾害来“谴告”的神话。他要老百姓一切按天道——封建伦理道德行事，如不忠不孝，得罪君、父，就是得罪了老天爷。农民造反，是逆天行事，而“反天之道，无成者”，必将受到“天”的惩罚。他把“天”捧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把天威说得活灵活现，目的是用以恐吓人民，不许人民反抗封建统治。

## 桑弘羊

桑弘羊（公元前152——前80年），洛阳人，西汉时代杰出的法家和唯物主义思想家。曾参与制定汉武帝时的盐铁官营、酒类专卖等法家政策，积极贯彻执行武帝的法家政治路线，对巩固封建中央集权，抗击匈奴奴隶主贵族的侵扰等作出了重要贡献。武帝死后，他继续坚持法家路线。公元前八十一年，统治阶级中的复辟势力纠集了一批“贤良”“文学”反动儒生，在政府召开的盐铁会议上围攻桑弘羊。这是西汉中期儒法两家

思想政治路线上的一场激烈斗争。在斗争中，桑弘羊坚持法家的进步思想传统，对孔孟以至董仲舒之流的反动思想进行猛烈抨击，深刻揭露了“贤良”“文学”们的反动主张，勇敢地捍卫了法家的路线和政策。他继承先秦法家天人相分的唯物主义观点，痛斥董仲舒的“天人感应”、“阴阳灾异”等谬论，认为天是否风调雨顺，会不会出现水旱饥荒，是一种自然现象，与人事无关。他认识到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物极而衰，终始之道”；认为社会历史也是不断前进的，提出明“时世之变”的进步历史观，批判了儒生们“复往古之道”和董仲舒“奉天而法古”的反动思想。他强调从实际斗争出发，提倡“处实而效功”，揭露反动儒生只会夸夸其谈，“有华言矣，未见其实也”。他还热情地赞扬了法家秦始皇、商鞅、李斯等人的功绩，深刻批判了儒家鼻祖孔丘，用“强”（顽固）、“贪”（贪婪）、“愚”（愚蠢）、“耻”（可耻）四个字刻划出孔丘没落阶级的本色，表现了桑弘羊哲学思想的鲜明的党派性。但他毕竟是地主阶级的思想家，鄙视人民群众，污蔑农民起义，存在着剥削阶级的偏见和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

## 《盐铁论》

记载西汉昭帝时盐铁会议论战的著作。公元前81年。在汉朝政府召开的一次盐铁会议上，法家代表桑弘羊与六十几个反动儒生，就盐铁官营和酒类专卖等问题

进行了一场大辩论。这场辩论实质上是西汉时代儒法两家思想政治路线上的一次激烈斗争。桑弘羊以鲜明的法家观点，充分肯定和坚决维护了汉武帝的法家政治路线，高度赞扬和评价了秦始皇、商鞅、李斯等法家人物的历史功绩，深刻批判了孔孟之徒鼓吹的复辟倒退的儒家路线。事后，桓宽根据会议记录整理写成《盐铁论》一书，基本上记录了这次盐铁会议上双方辩论的对话。虽然由于桓宽站在儒家立场，全书具有尊儒倾向，但仍掩盖不住法家思想的光芒，是研究西汉儒法斗争历史和法家桑弘羊的思想的重要资料。

## 讖 纬

两汉时期流行的儒家神学。“讖”本是一种“预决吉凶”的宗教预言，又叫“讖记”。“纬”原指天象，后来封建统治者利用天上星象的变化来附会人事，或预卜吉凶；拿这种观点来注释儒家的经典，就是所谓“纬书”。“讖记”和“纬书”充满神学迷信，专门宣传“天人感应”，把儒家的反动说教神秘化、宗教化，统称“讖纬”。讖纬神学于西汉末年开始流行，刘秀在参加农民起义队伍的过程中，就一直利用符讖迷信来欺骗人民。他曾伪造和大肆宣扬一条讖文：“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妄图使人相信，自己应该上应天命当皇帝。他当了皇帝后，正式“宣布图讖于天下”，

以致东汉时期谶纬神学达到极盛，成为官方的统治思想。在东汉末年农民起义打击下，又经唯物主义者桓谭、王充等的揭露和批判，谶纬神学越来越失去其欺骗作用，南北朝以后逐渐衰亡。

## 《白虎通义》

把孔孟之道与谶纬迷信结合起来的一部反动儒家著作，又称《白虎通》或《白虎通德论》。西汉元帝时儒学独尊后，日益和谶纬神学合流。公元79年，东汉章帝刘烜在洛阳北宫白虎观召集一批儒生，考释儒家诸经的同异，参加讨论的人对经义的解释，十之八九内容出于谶纬。由班固编写的《白虎通义》一书，就是当时讨论的结集。全书共四十三篇，包括了儒家的宇宙观、宗教观、历史观、伦理观、政治观、经济观、文化观及典章制度等各个方面，它把谶纬神学和尊孔复礼结合起来，使封建的政治制度和伦理道德更加系统化、神学化，俨然成为一部反动封建法典。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它进一步发挥了董仲舒的“天人合一”、“天人感应”论，用天命和谶纬迷信解释宇宙和一切社会现象，给地上的封建王权披上天上神权的外衣。它赋予天地日月等自然现象以尊卑贵贱的意义，用来比附人和人的关系，从而把君权、父权、夫权的封建统治秩序说成是天经地义的。它还明确规定了“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六纪”（“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

朋友”）、“三教”（“忠”、“敬”、“文”）、“五性”（“仁、义、礼、智、信”）等一系列封建伦理纲常、道德规范，作为永世不变的封建道德和最高的政治标准，成为两千年来封建统治者愚弄和奴役人民的思想工具。

## 桓 谭

桓谭(约公元前23——公元50年)，字君山，沛国相（今安徽宿县）人，东汉唯物主义哲学家。政治上是中小地主的代言人。在哲学上的主要贡献是反对谶纬神学。他以朴素唯物主义观点批判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和谶纬神学，揭露谶纬是“奇怪虚诞之事”，不可相信。他认为“灾异变怪者，天下所常有，无世而不然”，就是说，灾异是自然界常见的现象，任何地方、任何时代都会出现，不值得奇怪。这就否定了董仲舒把灾异说成是上天谴告的谬论。他还正确解决了古代哲学中的形神关系问题。他拿烛火为例，以烛比喻人的形体，烛上所燃的火比喻人的精神，说明精神不能脱离形体而独立存在，有烛才有烛火，有人的形体才有人的精神，烛烧完，火就灭，人死后，精神也就消失。这种形毁神灭的唯物主义观点，对后来王充、范缜的神灭论，有重大影响。在政治思想上，桓谭主张法治，赞成“权统由一，政不二门，赏罚必信，法令著明”，反对纵容世家豪族；并建议重用有创见、敢于革新的人。由于东汉时儒家谶纬



神学成为官方哲学，法家思想处于受压地位，桓谭虽反对谶纬迷信，但不敢反对儒家经典，表现了他反儒思想的局限性。

## 王 充

王充(公元27——约100年)，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县)人，东汉唯物主义哲学家，战斗的无神论者。重要著作有《论衡》。

王充站在法家立场上，以反潮流的革命批判精神，向当时独尊的孔孟儒学进行挑战，公开提出：“追难孔子，何伤于义？”“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并以大量事实揭露了孔孟言行的虚伪和欺骗性，粉碎了吹捧孔孟为“生知”、“先觉”，视孔孟之道为万古不变的教条的神话。王充坚持唯物论，反对唯心论，有力地批判和打击了董仲舒之流的神学目的论和谶纬神学迷信思想。他论证说明天没有意志，不能干与人事，万物是由物质性的“气”产生的，并不受神意的支配，“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随行而应人”，揭露了“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的谎言。他发挥了桓谭以烛火喻形神的唯物主义观点，指出世界上没有无物而能燃的火，也没有脱离形体而独存的精神，论证了无鬼论和神灭论思想。

王充坚持朴素唯物论的反映论，反对唯心论的先验论，认为人要认识外部世界，“须任耳目以定情实”，即要通过感觉器官的直接观察，而且“是非者不徒耳目，

必开心意”，即判断认识的是非，除感官感觉之外，还要重视理性思维的作用。他特别重视通过“效证”来检验认识，认为“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他还提出“须学以圣”的命题，批判了唯心主义天才观。

王充指出社会历史是发展进化的，批判了董仲舒之流“尊古卑今”、“奉天而法古”的复古倒退思想。他还肯定了商鞅的耕战政策，指出秦始皇焚书坑儒是起于儒生“多为妖言”，揭露儒者攻击焚书坑儒的言论“非其实”，显示了尊法反儒精神。

王充思想的阶级和时代局限性表现在，对孔孟的批判主要采取形式逻辑的方法，未能从政治路线上揭露儒家的反动本质；认识不到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把社会人事说成绝对受自然命运的支配，陷入了自然宿命论。

## 《论衡》

东汉杰出的唯物主义者王充的著作，三十卷八十五篇（实存八十四篇）。王充自称他写此书是鉴于“伪书俗文，多不实诚”，“《论衡》者，论之平也”，要进行批判，求得真理。王充在《论衡》中，总结了汉代自然科学的成果，继承了荀况、韩非的唯物主义思想，对当时风行的“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和讖纬迷信思想，作了有力的揭露和驳斥，在批判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古代唯物主义的体系。书中的《问孔》、

《刺孟》和《知实》篇，把批判矛头直指孔丘孟轲，揭露了孔孟言行不一的伪君子面目和孔孟之道的自相矛盾，表现了反潮流的勇敢战斗精神。《论衡》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一部光辉著作，也是研究两汉时期儒法斗争的宝贵资料。

## 四

东汉末年黄巾大起义，有力地打击了东汉的封建统治，加速了它的灭亡。魏晋南北朝时代，社会的阶级矛盾很复杂，主要的是广大人民群众与世家豪族的矛盾。反映在意识形态上，在曹魏正始年间，出现了反玄学和玄学的斗争，主要是郭象、裴颢的唯物主义“崇有论”同何晏、王弼的客观唯心主义“贵无论”的斗争。南北朝时代，佛教盛行，出现了范缜的唯物主义“神灭论”同佛教唯心主义的“神不灭论”的斗争。同时还有鲍敬言的反压迫、反剥削、反追求享乐的唯物主义思想对世家豪族的主观唯心主义享乐思想的斗争。

### 黄巾起义

东汉末年的农民大起义，爆发于公元184年。起义之前，民间就流行着“小民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轻”的歌谣，表现了劳动人民敢于反抗封建统治阶级、反抗天命论的革命造反精神。黄巾大起义的领导人张角自称天公将军，他的弟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就是要公平，反映了当时农民思想。黄巾起义的口号是“苍天已死，黄天当

立”，就是说要推翻汉朝的反动统治，建立起农民政权，变地主贵族之天为农民之天。这种要“变”的自发辩证法思想，是对儒家“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观点的反抗和批判。黄巾起义军还提出“人人有筋骨，各自衣食其力”的朴素平等思想，否定了儒家鼓吹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反动统治思想。这次大起义，有力地打击了世家豪族及其所宣扬的儒学，加速了东汉王朝的灭亡。

## 曹 操

曹操(公元155——220年)，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汉末杰出的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军事家。他公开申明“性不信天命之事”，批驳儒家“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反动观点，反对鬼神迷信活动，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他认为“天地间人为贵”，注意发挥人的能动作用。在政治上，反对礼治，实行法治；反对象门第资历和儒家“仁义”，“忠孝”的道德标准选用官吏，实行“唯才是举”，用人唯贤。在军事上，“禁妖祥之事”，重视调查、侦察，还用强弱、盛衰、胜败可以互相转化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创造了“官渡之战”以弱胜强的典型战例。由于推行了一条尊法反儒，坚持统一反对分裂，坚持前进反对倒退的法家路线，曹操打击和消灭了许多世家豪族割据势力，统一了华北和中原地区；同时继承法家耕战政策，强调“定国之术在

于强兵足食”，实行屯田，恢复农业生产，推动了当时北方经济的发展。但曹操毕竟是地主阶级的政治家，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早年曾镇压黄巾起义；他同豪强地主的斗争和对儒家的批判是不彻底的；有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

## 玄 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儒道合流的唯心主义哲学。所谓“玄”，出自《老子》里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即所谓玄妙得很的“玄妙”。当时玄学主要研究《老子》、《庄子》和《周易》这三本书，总称“三玄”，所以玄学实际上是“道”与“儒”的结合。玄学主张“以无为本”，把世界说成是“空”的，是“虚无”的。宣扬尚“自然”，即崇尚“无为”，这是道家的观点；笃名教，即崇尚“三纲五常”之教，这是儒家的观点。玄学家说“名教本于自然”，这就是道与儒的合一。玄学的反动性在于，妄图使人们无视现实的斗争，安于现状，从思想上消除人民的反抗，从而维护封建纲常名教和世家豪族的反动统治。

## 何 晏

何晏(公元190——249年)，字平叔，南阳(今河南省南阳县)人，客观唯心主义者，玄学倡导者之一。政治上是个地地道道的尊孔派，吹捧孔丘为“与天地合其

德”的圣人，吹捧董仲舒“儒雅博通”，宣扬天命论，维护儒家尊奉的“名教”。哲学上认为宇宙的本体是“虚无”，胡说精神世界创造物质世界。倡导“贵无论”，宣扬“天地万物皆以无为为本”，人人笃守“无为”，即遵守封建名教，就可以保存自己而免于灾祸，这就是要人民群众接受“无为”思想，不斗争，不反抗，以巩固封建统治秩序。

## 王 弼

王弼（公元226—249年），字辅嗣，魏国山阳（今河南修武县）人，玄学倡导者之一。他站在维护世家豪族特权的反动政治立场上；尊崇儒家，极力维护儒家的伦理道德；攻击法家，反对打击世家豪族的“法不阿贵”的法治路线。哲学上同何晏一样，倡导客观唯心主义的“贵无论”。他把老子“致虚极，守静笃”的形而上学和儒家“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杂糅起来，强调“一”，说万物万形，都复归于“一”，“一”就是“无”，“贵无”就是贵“一”，也就是否认矛盾，取消斗争，合二为一。他认为，万物虽然动作，最后却复归于“虚”“静”，取消一切运动和变化发展。由此，他极力宣扬“执古可以御今”，即以复古来对抗现实的变革；宣扬在大变革面前，要做到一个“贞”字，即顽固不化，这完全是儒家的复古主义和道家开历史倒车的反动思想的发挥。后世的宋儒十分强调“静”，周

敦颐认为“一”最重要，“一”就是“无欲”，“无欲”就能“虚静”，都受到王弼思想的影响。

## 贵 无 论

一种客观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以何晏、王弼为代表。贵无论主张，“玄道”便是“虚无”，认为宇宙的本体不是物质，而是精神，物质世界是由精神世界创造出来的。在政治上，倡导“无为”，要人民不反抗，不斗争，遵守儒家的封建“名教”，即封建的伦理纲常，完全是为维护世家豪族的反动统治服务。

## 郭 象

郭象（公元252——312年），字子玄，河南洛阳人，西晋唯物主义哲学家，玄学中的革新派。他承认宇宙本体是物质性的，认为人的生死是由于气的聚散；反对何晏、王弼的“有生于无”论，提出“有物之自造”，即物是自己自然生成的观点，把这种物质生成的道理称为“独化”。但他强调人要“得其性”即要纯任主体精神的自由发展，“去离尘埃，而返冥极”，幻想离开所谓尘俗的物质世界，陶醉于精神的世界。这又流入主观唯心主义，说明他仍未摆脱玄学的影响和束缚。

## 裴 颢

裴颢（wěi音伟）（公元267——300年），字逸民，



西晋唯物主义哲学家，著有《崇有论》。他公开揭出“崇有论”的旗帜，反对“贵无论”，提出“自生而必体有”的唯物论观点，认为宇宙万物是以“有”即物质为本体而自生的。政治上反对“无为”，力主加强中央集权，反对分裂割据势力，以维护和加强对人民的封建统治。

## 崇 有 论

郭象和裴颢提出的唯物主义命题，是与何晏、王弼的“贵无论”相对立的。认为宇宙本体是物质性的“有”，而不是精神性的“虚无”，万物由“有”而生，不能无中生有。“崇有论”在政治上主张面对现实的政治问题，反对在“无为”掩盖下的世家豪族的纵情享乐，反映了庶族地主阶级的要求。

## 《列子·杨朱篇》

魏晋时代的人伪造的、冒称战国时列御寇的著作。它宣扬主观唯心主义世界观，贩卖否认真理具有任何客观标准的相对主义，把死生看成虚幻，否定人生的一切价值。认为人生应尽情享受，要“从性而游”，“从心而动”，“究其所欲，以俟于死”。这种混世等死的哲学思想，旨在为世家豪族从对于广大人民的残酷压榨与剥削中追求快乐和尽情享受提供理论根据，是极其反动的。

## 鲍敬言

鲍敬言（生卒年不详），大约是东晋时人，唯物主义者，进步思想家。他认为宇宙的本体是物质的阴阳二气，“天地之位”无所谓尊卑。尖锐批判了儒家宣扬君主统治人民，是由天决定的天命论。猛烈抨击以世家豪族为代表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剥削罪行和享乐思想。从揭露当时尖锐化的阶级矛盾斗争中而倡导“无君”，幻想实现一个不服力役，不交租税，安土乐业，顺天分地，足衣足食，无争无战的理想社会。鲍敬言的反压迫、反剥削、反追求享乐的唯物主义思想，反映了农民群众的某些要求。但他没有发展进化的历史观，缺乏通过斗争而向前看的思想，是其思想的局限性。

## 佛 教

世界性宗教之一。大约在公元前六世纪到五世纪时产生于印度，东汉时开始传入我国。到西晋后期，世家豪族为挽救其统治危机，需要在儒学和玄学以外再找思想工具，因而特别重视利用佛教。南北朝时代，佛教大为盛行。当时南方盛行的大乘佛教空宗般若学说，从客观唯心主义观点企图证明客观世界的虚幻，提倡向精神世界中寻求解脱，与玄学中的“贵无”思想相接近。北方的佛教则宣扬主观唯心主义，着重（坐）禅（入）定，引诱人们从宗教生活中养成乐天知命、绝对服从的

奴化性格。佛教徒竭力鼓吹“神不灭”即灵魂不灭论，宣扬因果报应说和轮回转生说，胡说人的生命不限于今生，一个人的善恶行为都由本人在轮回转生中受到报应，从而加强对劳动人民思想的毒害，要人们甘于忍受压迫剥削的痛苦，以便取得所谓来生的幸福。佛教为当时的阶级压迫和等级制度提供神秘主义的论据，同儒学玄学一样是为以世家豪族为代表的反动封建统治服务的。随着佛教的盛行，劳动人民和一些进步思想家也开展了反佛教思想的斗争。

## 禅 宗

中国佛教史上一大宗派，开始时因强调禅定（宗教修养的一种方法），故名禅宗。在封建统治阶级的支持下，佛教在隋唐时代进入全盛时期，相继出现许多宗派，禅宗是中唐以后流行甚广、最有影响的一个宗派，其代表人物是惠能和尚。禅宗宣扬有先验的觉悟和智慧，说什么人性中本来就有佛性，因而不必外求，不用读很多烦琐的佛教经典，只要直接从事内心观照，使妄念俱灭，悟得本来的“自性”，就可以“顿悟”成佛。这种简易廉价成佛的主观唯心主义教义，既容易欺骗群众，也最适合统治阶级需要，并且较之其他宗派更与儒家的思想相吻合，因而流毒甚广。宋代以后，和道儒结合，构成理学的哲学体系。

## 范 缜

范缜(约公元450—515年),字子真,南朝齐梁时期舞阴(今河南泌阳县西北)人,我国古代杰出的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他继承了法家的唯物主义传统,对孔孟之道和佛教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同当时宣扬佛教的王公贵族和僧侣进行的两次大论战中,他反对佛教的因果报应说,认为富贵贫贱并非天命决定或前生果报,而是出于偶然性;反对佛教的“神不灭论”,坚持“神灭论”,认为精神不可能离开形体而独立存在,人死了,灵魂也就没有了;并痛斥佛教祸国殃民之害。他还主张革新政治,选拔人才“不由等级”,在反世家豪族的政治斗争中表现了鲜明的法家倾向。围绕着范缜“神灭论”的唯物论与唯心论的论战,也是一场尊法反儒与尊儒反法的论战。在论战中,范缜始终坚持真理,不怕围攻,并拒绝反动统治者的收买,不肯“卖论取官”,表现了战斗唯物主义者的坚定立场和无畏精神。但是,他在反宿命论时,过分强调了偶然性;在反对“神不灭”论时,认为圣人和凡人的形和神天生不同,陷入了宿命论和唯心主义的先验论,这些都表明了他的旧唯物主义者的局限性。

### 《神 灭 论》

范缜反佛教“神不灭论”的光辉著作。《神灭论》

从“形神合一”，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前提出发，认为“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形”（人的形体）是“神”（人的精神）的实质，“神”是“形”的作用，“形”“神”的关系就象刀和锋利的关系一样，二者不能分开，有力地驳斥了佛教的所谓精神可以脱离形体独立存在的灵魂不灭的唯心主义理论。他还认为人的本质是“有知”的，并从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说明了认识的两个阶段，指出认识来源于感官对客观事物的反映，驳斥了佛家认为认识是“真如”自性本有的宿慧，即认为人的内心有神秘先验的认识能力的唯心主义论点。《神灭论》还认为，万物的生成“禀于自然”，事物的发展变化依存于自己内在的运动变化。但《神灭论》也有其局限性，如认为所谓圣人与凡人的形和神天生就不相同，结果不可避免地陷入自然宿命论。

## 五

隋末农民大起义，推翻了隋朝的残暴统治，基本上打垮了世家豪族势力，为唐代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繁荣创造了条件。

唐代社会阶级矛盾，主要是地主阶级（包括僧侣地主和世俗地主）同广大劳动人民的矛盾。阶级矛盾尖锐对立的结果，公元874年，爆发了以王仙芝、黄巢为首的农民大起义。起义军提出了“冲天”的革命口号，向孔老二的“天命论”和董仲舒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宣战，对孔学进行了严厉的武器批判。

隋唐时代，除起义农民对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天”进行批判外，在哲学上有傅奕、吕才的唯物主义无神论与封建统治阶级所宣扬的宗教迷信思想的斗争；地主阶级革新派柳宗元、刘禹锡的唯物主义“天人相分”论与保守派韩愈的唯心主义“天人相与”论的斗争，这是当时儒法两家在哲学思想战线上的一场激烈斗争。

### 傅 奕

傅奕(公元555——639年)，唐初反佛教的思想家。以唯物主义自然观为指导，反对由佛决定人的死生祸福

的宗教迷信思想，认为：“生死寿夭，由于自然；刑德威福，关之人主。”人的生死或长命、短命，是由于自然原因；而人的遭遇祸福，则是由君主决定，与信不信佛无关。他著有《老子注》，并把魏晋以来反对佛教的人物汇编为《高识传》。

## 吕 才

吕才(公元600? —— 665年)，唐初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家。他继承和发挥了汉代王充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反对儒家讲的天有意志以及阴阳迷信等。坚决反对宿命论，认为贵贱寿夭的遭遇是人为的结果，并主张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历史观上，以历史进化论反对反动的历史循环论。但他和过去的法家一样，把历史文化的创造归功于“圣人”，表现出他所处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

## 韩 愈

韩愈(公元768——824年)，字退之，昌黎人，一说河阳(今河南孟县)人，唐代唯心主义思想家、文学家，儒家代表人物，宋明理学的先驱。其著作有《韩昌黎集》。政治上基本上属于大地主阶级保守派，反对王叔文等的政治革新。哲学上，属于客观唯心主义，在天有意志论受到柳宗元等的有力批判后，提出“道”这一客体精神来代替“天”的地位，把仁义道德说成是先验

她存在于人们主观之中的东西。他提出并拚命鼓吹所谓一脉相传的儒家“道统”，攻击秦汉之际的法家政治路线，以儒家正统派继承者自命，极力反对“去圣人之道，舍先王之法”。韩愈的这种观点对后来宋明理学特别是程、朱客观唯心论一派，有重大影响。他还承袭董仲舒的“性三品”说，兜售反动的地主阶级人性论，诬蔑劳动人民是下品人性“恶而已矣”，无可教化，只能加以严刑峻法，使他们“畏威而寡罪”。此外，韩愈为维护儒家正统地位，站在世俗地主阶级立场上反对僧侣地主，曾对佛教进行了猛烈的抨击。韩愈也有一些违背孔孟的言论，说明他思想中存在某些矛盾。

## 李 翱

李翱（生年不详，卒于公元841~846年之间），唐代儒家代表人物之一，主观唯心主义者，韩愈的学生。他提出反动的“复性”论，说什么人的先天的“性”都是善的，而后天的“情”则有善有不善。百姓的“性”为邪妄的“情”所蔽，要恢复本来的善“性”，就必须去“情”，即“循礼”、“忘欲”，遵守封建礼法，放弃物质欲望，甘心做封建统治阶级的奴才。这个“复性”论对后来宋明理学特别是陆、王主观唯心论一派，有重大影响。“复性”在政治上就是要“复旧制”，反对政治革新，他咒骂“秦灭古法，隳井田”，妄图恢复井田制的赋税制度，充分暴露出尊儒反法的反动面目。



## 柳宗元

柳宗元（公元773—819年），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县）人，唐代地主阶级革新派，唯物主义哲学家，著名文学家。著作有《柳河东集》。政治上反对贵族、宦官和官僚大地主的特权，反对地方分裂割据势力，曾参加“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谪远方，死于柳州贬所。哲学上坚持物质性的“元气”是万物的本原，并指出了宇宙的无限性。反对韩愈认为天有意志，能够赏善罚恶的唯心主义“天人相与”论，宣传“天人相分”的唯物论无神论思想，认为天不能干预人事，人应该改造自然。他指出，自古以来宣扬天神迷信，都是为了欺骗老百姓；并对汉代董仲舒以来的神学目的论进行了一次带有总结性的批判。在著名的《封建论》一文中，阐述了他的政治主张和尊法反儒思想。但他反儒还是不彻底的，被贬后受到一些佛家出世思想的感染，晚年思想带有折中主义色彩。

### 《封建论》

柳宗元著名的尊法反儒哲学政治论文。文章总结了秦汉以来分封制和郡县制的论争，高度评价了秦始皇建立封建中央集权国家，用郡县制代替分封制的历史功绩。论证指出郡县制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不应革除，有力地回击了现实存在的分裂、复古、倒退的逆流，为

他主张革新政治的目的服务。文章还认为，一种政治制度的建立，“非圣人意也，势也”。就是说不是“圣人”意志的产物，而是客观形势所造成的，这个卓越见解有力地批判了儒家所鼓吹的天命论。但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他不可能对国家的起源和社会发展的规律作出正确解释。

## 刘禹锡

刘禹锡(公元772——842年)，字梦得，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唐代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文学家。著作有《刘宾客集》。政治上和柳宗元一样，属于尊法反儒的地主阶级革新派，曾参加“永贞革新”。他的哲学思想突出反映在《天论》三篇中。认为“天”是物质性的，并论证了空间与物质存在的关系，指出物质存在于空间，空间布满了物质，从而批判了魏晋玄学的贵无论以及佛学的“空”的思想。反对天有意志的神学观念，指出天命和迷信的思想起源于社会政治制度的腐败。发展唯物主义的“天人相分”论，独创地提出了“天人交相胜”的学说，认为自然界的规律不同于人类社会的规律，但人却有制服自然的能力，可以利用和改造自然。但他的社会历史观仍是唯心主义的，并没有也不可能看到天命和迷信思想产生的社会经济和阶级的根源。

### 天人交相胜

刘禹锡提出的关于天人关系的唯物主义观点。他认

为天是自然，不能干预人事，人却有制服自然的智慧和能力。“天之所能者生万物也，人之所能者治万物也”。人们掌握了自然规律，就可以“用天之利”，征服和利用自然，做到“人胜天”；否则，自然就可能给人带来祸害，即“天胜人”。在政治上，他提出“人能胜乎天者，法也”，认为如果“法大行”，政治清明，人们就相信自己而不信天命，这是“人胜天”；否则，“法大弛”，政治黑暗，是非颠倒，天命迷信思想就会盛行，这是“天胜人”。刘禹锡的“天人交相胜”论，是对荀况的“天人相分”、“制天命而用之”唯物观点的继承和发展，也是为尊法反儒的革新路线服务的。

## 黄巢起义

唐朝末年的农民大起义。起义军公开向孔老二的天命论和董仲舒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宣战，提出“冲天”的革命口号，黄巢自称冲天大将军，大造“君权神授”的反。针对“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的不平等现实和封建等级制度，提出“均平”的政治纲领。起义军所到之处镇压唐宗室和世家豪族，扫荡孔孟儒学。起义军转战十年，于880年攻入长安，基本上打垮了李唐王朝。这次大起义，打垮了世家豪族势力，将中国封建社会向前推进了一步。

## 六

唐末以黄巢为首的农民革命战争，彻底打垮了世家豪族势力，推动了宋代社会经济的进一步繁荣和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唐宋以后，进入封建社会后期。反动统治阶级及其代言人，为了维护和挽救日益腐朽的封建统治，更加扯起尊儒反法的黑旗，炮制了以儒家思孟学派为宗、杂糅玄学和佛学思想的唯心主义“理学”。宋明理学包括程（颐）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和陆（九渊）王（守仁）的主观唯心主义两大流派，目的都在于禁锢、毒害人民的思想，维护“三纲五常”。它成为封建社会后期的官方哲学。

宋元明时期哲学的两军对战主要表现为：北宋地主阶级改革家王安石的“新学”对二程唯心主义理学的斗争；南宋陈亮、叶适的唯物主义和功利思想对理学的斗争；明代张居正对理学的批判；特别是反映市民层若干利益和要求的李贽思想，对孔孟及儒家理学进行了空前猛烈的冲击。明清之际至鸦片战争以前，是封建社会中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在明末农民革命战争推动下，王夫之、颜元、戴震等从批判唯心主义理学的斗争中发展了朴素唯物主义思想。

宋元明时期，作为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风起云涌，斗争矛头直指反动的封建制度以及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伦理纲常和唯心主义理学，提出了要求平均土地等政治纲领。如宋代的王小波、李顺起义，方腊起义，钟相、杨么起义，元末红巾军起义，明代刘六、刘七起义等；特别是明末李自成和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大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和儒家理学，推动了历史向前发展。

### 王小波、李顺起义

北宋初年四川地区的一次农民起义。起义军明确提出了“均贫富”的战斗口号，要求平均财产和地权，反映了农民要消灭封建地主阶级所有制的革命思想。起义军对孔学实行了猛烈的武器批判，所到之处，捣毁地主豪绅武装盘踞的庙宇，烧毁成都孔庙和孔老二及其门徒的画像，表现了大无畏的反孔精神。

### 周敦颐

周敦颐（公元1017—1073年），字茂叔，湖南道县人，北宋客观唯心主义者，宋明理学先驱之一。主要著作有《太极图说》和《通书》。他剽窃道家观点，编制了一套所谓“无极而太极”的宇宙生成学说。他认为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即五行，是从阴阳二气来的；阴阳统一于太极，太极是“理”，是客体精神；

而太极又是从“无”产生的，是无中生有。这也就是说，“太极”——客体精神的“理”是第一性的，物质是第二性的。他又发挥了儒家思孟学派提出的“诚”，把“诚”说成是“无极”本体的体现，又是人的至善的本性，是仁、义、礼、智、信的根本，从而用“诚”将宇宙本体和先验的人性以至封建道德伦理统摄起来，成为天理所秉赋的至高无上的东西。而要做到“诚”，就必须“主静”，即不能有物质欲望，要安安静静，遵守封建礼教，不能造反。可见周敦颐的哲学思想完全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

## 邵 雍

邵雍（公元1011——1077年），字尧夫，河南共城（今辉县）人，北宋主观唯心主义者，宋明理学先驱之一。主要著作有《皇极经世》。政治上与司马光等顽固派一起大肆攻击王安石变法。其哲学是神秘主义的所谓“先天象数学”。他从道家方士那里传来一个所谓先天图，说什么：“先天学，心法也。图皆从中起，万化万事皆生于心也。”认为“心为太极”，即心是产生万事万物的根源，胡说“天地自我出”、“乾坤只在身”，从而宣扬主观唯心主义的认识论，认为“万物于人一身，反观莫不全备”，要取得认识，不用接触外界事物，只要观察自己的内心就够了。这种观点对后来理学中“心学”一派的陆九渊王守仁等有很大影响。他还把字

宙万物的生成，说成是抽象概念的数学经过倍数相乘得来，即所谓象数学，并用他主观安排的象数来解释世界，推算古往今来治乱盛衰的命运，宣扬历史的神秘主义和命定论，要人民安分守己、听天由命。邵雍的这套神秘哲学，是极其荒唐而反动的。

## 张 载

张载（公元1029——1077年），字子厚，陕西凤翔横渠镇人，北宋唯物主义哲学家（过去曾被不恰当地列为理学家）。主要著作有《正蒙》。张载从理论上对佛、老讲虚无寂灭的唯心主义世界观进行了批判。他把物质性的“气”作为宇宙的本原，认为“气”充满宇宙的空间，由于“气”的聚散变化，形成天地万物。他还提出“不有两，则无一”，“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两”指对立的两面，“一”指对立两面的统一。他认为：如果没有对立两面的存在，就没有统一体的东西；如果没有统一体的东西，那么对立面的作用就不存在了。这表明他已初步猜测到对立统一的关系。他还认识到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事物是在矛盾变化中成长起来的，所以他说：“屈伸相感而利生焉”。这些思想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因素，在某种程度上起着反理学的作用。但他又认为“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即三纲五常这些先验的天理不依赖感官所得的先天知识，从而陷入唯心论的先验论。他把人性分为

先天固有的至善的“天地之性”和后天的有善有恶的“气质之性”，宣扬地主阶级唯心主义的人性论。他还主张“仇必和而解”的阶级调和论，宣扬安命思想，要人民服服帖帖当封建统治者的奴隶。这是他思想的落后面。

## 虚 空 即 气

张载的一个唯物主义观点。他认为，世界的本质是气，即物质。他说：“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就是说，天空虽是无形，却充满着物质性的气，气有聚有散，聚为万物则有形，散归天空又变为无形。“盈天地之间者，皆物也”。这就肯定了世界的物质性和物质不灭原理，批驳了道家的“虚无”和“有生于无”的谬论，也批驳了佛教的“虚无寂灭”说。

## 程 颢

程颢（公元1032—1085年），字伯淳，河南人，北宋儒家代表人物，理学奠基者之一。其著作与程颐的合编为《二程全书》。政治上属于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地主阶级顽固守旧派。哲学上属于主观唯心主义。他把“道”（精神）或“理”看成是超出物质之上的世界本体，而“天即理即心”，“道”或天理就在人的心中，从而鼓吹唯心论的先验论，说“学者不必远求，近取诸身，只明天理”，要人们从自我修养中去穷尽“天理”。



他把父子君臣这一套伦理纲常和封建秩序，说成是不可改变的“天下之定理”，把劳动人民要求最低生活的欲望也说成是罪恶，是“伤天害理”的东西。可见他讲天理人心，完全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

## 程 颐

程颐（公元1033——1107年），字正叔，河南人，北宋儒家代表人物，理学奠基者之一，程颢的弟弟。政治上坚持复古倒退，顽固反对王安石变法。哲学上属于客观唯心主义。他和程颢一样，把“理”或“道”说成是世界的本原，认为“理先气后”，物质性的“气”，产生于精神的“理”。和程颢不同的是，他认为理是“出诸天而具诸心”，即理是客体精神，是天赋于人的心中的。胡说有些人所以不认识天理，是由于存在“人欲”，因而也鼓吹修心养性，说什么要做到“灭私欲，则天理明矣”。程颐提倡的理学，除维护儒家的君臣父子之道外，还特别迫害妇女，他首先提出“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谬论，认为女人死了丈夫，即使饿死也不能改嫁。这种反动说教提出后，不知摧残了多少妇女的生命。

## 二 程

即程颢、程颐两兄弟。二程是宋代儒家的代表，他们继承了孔丘和董仲舒的反动衣钵，把反动孔学发展成

唯心主义理学，因而受到历代反动统治者的吹捧。特别是程颐的客观唯心主义，后来又经朱熹发挥，成为官方的正统哲学，统治元、明、清思想界数百年。

## 理 学

宋明儒家的哲学思想，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反映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官方哲学。它继承儒家思孟学派的唯心主义思想，并杂以佛教和道教思想，把“理”作为核心，高谈“性命义理”，故称“理学”或“性理学”。宋儒以继承孔孟道统自居，并把“理”和“道”看成一样东西，故又称“道学”。

理学发端于唐代的韩愈和李翱，发展至宋明时形成程（颐）朱（熹）和陆（九渊）王（守仁）两大流派。主要的程朱一派，所谓“程朱理学”，把“理”说成是产生天地万物的绝对精神，认为“理得于天而具于心”，人的知识是天上掉下来的，属于客观唯心主义；陆王一派则认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宣扬“心即理”，人的知识是自己头脑里所固有的，属于主观唯心主义，故又称“心学”。这两派把孔孟之道、封建伦理纲常说成是“天理”的体现，或是人人所固有的“本心”，异曲同工，殊途同归，都是为维护腐朽反动的封建统治服务的。清代戴震正确地指出，理学“以理杀人”，是从精神上压制和宰割劳动人民的工具。

## 程朱学派

以北宋程颐、南宋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学派。他们建立了一套客观唯心主义理学体系，成为理学中的主要派别，也是元、明、清的官方正统哲学。

### 心学

指理学中陆(九渊)王(守仁)学派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他们把“心”作为世界的本体，知识的源泉，胡说“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心即理”(陆)，“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故心外无学”(王)，认为宇宙万事万物都是人“心”的体现。他们把封建伦理道德的“理”说成是人人内心所固有的东西，鼓吹“发明本心”(陆)，“致良知”(王)，妄图让人们通过内心修养的方法，严格按照孔孟之道思考和行动，以维护反动腐朽的封建统治。刘少奇的黑《修养》经，林彪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贩卖的也是这类反动货色。

### 陆王学派

宋明理学中，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主观唯心主义心学学派。

### 理先气后

宋代程朱理学家关于物质与精神关系问题的唯心主

义观点。程颐把“理”说成是世界的本原。他认为，“理”就是“道”，“天有是理，圣人循而行之，所谓道也”，即上天有这个“理”，圣人循“天理”行事，就叫做“道”。“道”是精神，它产生物质，构成世界的“阴阳”是物质性的气，它是由“道”产生的，也就是“理”产生的，理在前气在后，就是说，精神是第一性的，物质是第二性的。程颐所谓的“理”，指天命，是客体精神，因而“理先气后”是一个客观唯心主义的命题。

## 格物致知

唯心主义认识论的命题。原出自《大学》：“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主张从内心思索考察万物的道理，以获得知识。这是为维护没落奴隶制服务的。

宋明理学也讲“格物致知”。客观唯心主义的程朱学派，认为“理”是万物的主宰，“格物”就是格去外物的“迁迷”和“人欲”的物念，通过闭门修身养性达到穷尽“天理”，恢复“天性”，认识“天命”（程颐），“格物”就是“穷天理，明人伦”（朱熹），这实质上是认为，人的知识是天上掉下来的。主观唯心主义的陆王学派认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格物者，格此（心）者也”，只要“发明本心”便可达到“知”（陆九渊），“是合心与理而为一”，“格物之功，只在心上做”，把“格物”看做是“格心”的

功夫（王守仁），这实质上是认为，人的知识是头脑里所固有的。两派说法虽不尽相同，但实质都是唯心论的先验论，是为维护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服务的。

我国历史上有些唯物主义者批判儒家唯心论时，曾对“格物致知”作出唯物主义的解释，如颜元认为格物的“格”是指“手格猛兽之格”，包含着斗争的意义；所谓“格物”就是“犯手实做其事”，“亲下手一番”，然后才能“致知”——获得知识。但他们不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因而不能彻底驳倒唯心论的先验论。

## 王 安 石

王安石（公元1021——1086年），字介甫，江西临川人，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唯物主义哲学家，列宁称之为“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他的著作现存的有《周官新义》（辑本）和《王临川集》。

王安石在宋神宗熙宁年间，两次做宰相，推行新法。他的变法反映了中小地主与大地主之间兼并与反兼并的斗争，也是当时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一场革新和守旧的斗争，因而遭到司马光、程颢、程颐等大官僚大地主顽固派的反对。他尊法反儒，反对董仲舒“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观点。他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精神和孔丘“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的反动说教直接对立，痛斥顽固派是“俗儒”、“庸人”。

在哲学上王安石继承了唯物主义传统，认为天地万物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即“五行”变化生成的。他认为事物所以运动变化，是由于事物本身“有耦”、“有对”，即有矛盾，而且“耦之中又有耦焉，而万物之变遂至于无穷”，即矛盾之中又有矛盾，万物才能变化无穷。这有着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他的认识论，也有一些唯物主义观点，强调“视”与“听”的作用，把它作为“思”的前提。他反对孟轲的性善论和荀况的性恶论，认为人性的善、恶是后天的，是人接触外界事物后在感性上的表现，批判了在人性论问题上唯心论的先验论。

作为地主阶级的革新派，王安石变法只是为着缓和社会矛盾，改变北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他的思想也夹杂着不少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成分。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王安石变法还是有一定进步作用的。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斗争，是在封建社会后期孔孟之道已成为正统思想的条件下所开展的一场规模较大的儒法论战。因此，当时以及后来的一切没落阶级顽固派都百般咒骂王安石。

## 王安石新学

王安石为推行新法而提出的与反动理学相对立的学术思想。他吸取先秦法家思想，通过对儒家经典《诗》、《书》、《周礼》等的再解释，阐述自己的政治思想和哲

学观点，为变法制造理论根据。他的著作废弃了过去儒家的传统注解，成为背叛儒家正统的异端。当时变法与反变法，“新学”与理学的斗争，是封建社会长期进行的儒法斗争的继续。

## 王安石的“三不足”思想

对王安石变法革新精神的概括，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针对大地主阶级顽固派说什么日、月蚀，地震等是上天示警，必须废除新法的叫嚣，王安石坚持“天地与人，了不相关”（完全没有关系）这一“天人相分”的唯物主义观点，公然提出“天变不足畏”（自然界的异常现象没什么可怕的）命题，打击了儒家宣扬的唯心主义天命论。针对司马光之流“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叫嚷，王安石指出：“祖宗之法，未必尽善，可革则革，不足循守”，批判了儒家复古倒退的历史观。同时，王安石不为顽固守旧派种种攻击新法的言论所动摇，认为这些人的话“不足恤”，即没什么可以顾忌和考虑的。“三不足”思想，表现了王安石的唯物主义观点和尊法反儒的大无畏精神。

## 天道尚变

王安石在变法中提出“尚变者，天道也”，认为自

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新故相除”，即以新代旧，不断变化发展的。这是一种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和历史进化观点，是对儒家“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反动谬论的批判。

## 沈 括

沈括（公元1031——1095年），字存中，杭州钱塘（今杭州）人，北宋著名科学家，唯物主义思想家。政治上，主张革新，积极参与王安石变法，在兴修水利、改革历法、加强边防等方面都有所贡献。哲学上，以唯物论为武器，反对儒家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他认为“大凡物理有常有变”，而且“天地之变，寒暑风雨，水旱螟蝗，率皆有法”，就是说事物的变化发展是有规律可找的。在法家主张变革、反对守旧的思想指导下，他敢于冲破旧的传统观念，对所谓“圣人”的话和儒家经典持批判态度，努力钻研科学、技术，注意总结劳动人民的生产斗争经验，在天文、算学、物理、地理、生物、药物等方面都有广博的知识。他认为科技方面的创造发明，并不都是“圣人”搞的，“百工、市井、田野之人莫不预焉”。沈括的许多科学发现和见解，在当时都是先进的。他晚年所著的《梦溪笔谈》是我国和世界科学史上一部重要著作，其中记载了锻工毕升、木工喻皓、河工高超等劳动人民的发明创造事迹。



## 方腊起义

北宋末年由方腊领导的农民起义，于1120年（宋徽宗宣和二年）在浙江睦州（今浙江省建德）地区爆发，相继攻占六州五十二县。起义军“不事神佛祖先”，“无视君臣上下”，严厉镇压贪官污吏和反动儒生，建立了农民革命政权，对理学家所宣扬的君权、神权进行了猛烈的冲击。起义军“男女无别”，一起斗争，打击了“男尊女卑”的封建礼教。针对理学家们把封建统治说成所谓“天理”，方腊直接指斥封建剥削压迫行为是“安有是理”，而主张要“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才是“天下国家本同一理”。

## 朱熹

朱熹（公元1130—1200年），字元晦，号晦庵，徽州婺源（今江西省婺源）人，南宋儒家代表人物，反动的唯心主义哲学家。著作有《四书集注》、《朱子语类》等。朱熹是二程的四传弟子，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他宣扬客观唯心主义，鼓吹“理”是世界的本原，说“理在先，气在后”，精神派生物质。还把“理”说成“天理”，体现在人间就是“三纲五常”等封建教条，以此论证剥削有理，压迫有理。并宣称“性即理”，说人生下来就具有“三纲五常”的“天理”，提出“存天理，去人欲”，要人们铲除违反封建道德的“人欲”，妄图使

劳动人民永远安于被剥削压迫的地位。他完全继承并发展了孔孟的反动思想体系，吹捧孔丘说“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他编注的《四书集注》被以后的封建统治者规定为尊孔读经必读教科书。林彪大肆鼓吹反动“理学”，颂扬朱熹的“待人”哲学，崇拜朱熹编注的《四书集注》，目的就是古代反动派尊孔反法武库中寻找向无产阶级进攻的炮弹，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 《四书集注》

朱熹把《大学》、《中庸》从《礼记》中抽出来，同《论语》、《孟子》汇编在一起，称为《四书》，并为这四部书做了注释，称为《四书集注》。从明代开始《四书》和《四书集注》被作为我国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必读教科书和封建王朝进行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成为封建统治阶级进行思想文化统治的重要工具。林彪十分推崇《四书集注》，曾指使其同伙从中摘录大量言论，编成《四书集句》，作为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思想武器。

### 理一分殊

朱熹提出的一个客观唯心主义的命题。他说：“物物有一太极”，认为万事万物都由“太极”这一最高的“理”所产生，即所谓“理一”；而“太极”这个“理”又体现在每一个具体事物上，就象天上的月亮映照在所

有江湖水面上都有一个月亮一样，即所谓“分殊”。把这个观点运用到社会人事上，所谓太极（理一），实际就是最高的封建道德教条，此理的分殊，就是人人都要以这个最高的封建道德教条作为存在的根据，各自遵守君臣父子之理。很明显，“理一分殊”是维护封建统治的反动理论。

### 存天理，去人欲

朱熹提出的反动理学的纲领。朱熹胡说，没有天地之前，就有“理”存在，它是产生天地万物和人类的本原，孔孟之道“三纲五常”，就是“天理”的体现；而一切违反封建统治秩序的欲望、要求，都是“人欲”，是和“天理”对立的，只有去掉“人欲”，才可能使“天理”显现。可见“存天理，去人欲”的反动说教，是为剥削有理、压迫有理制造理论根据的。它要人们遵守“三纲五常”的封建教条，扼制劳动人民的物质要求和精神要求，灭绝“犯上作乱”的言论行动，妄图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制度永世长存。

### 陆 九 渊

陆九渊（公元1139—1192年），字子静，号象山，江西抚州（今江西临川县）金溪人，主观唯心主义者，理学中“心学”派的代表人物。他把儒家思孟学派的反动哲学和佛教禅宗思想结合起来，把“心”作为世界的本

体，认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唯我论。他宣称“心即理”，知识早已存在于“本心”中，因此“致知不假外求”，用不着参加社会实践，只要闭门修养，“发明本心”，即发挥心的作用，就可以无所不知。他把三纲五常说成是人心所固有的，要劳动人民“虽在贫贱患难之中，心自亨通”，即甘心忍受封建统治者的压榨，不要造反。他的反动学说为明代王守仁所继承和发展，形成理学中的陆王“心学”学派。

## 陈 亮

陈亮（公元1143—1194年），字同甫，号龙川，浙江永康人，南宋尊法反儒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理学的反对派。著作有《陈亮集》。政治上，反映当时工商业者的利益。主张对内促进政治革新，对外抗击金人的侵扰。哲学上，认为“盈宇宙者无非物，日用之间无非事”，肯定了世界的物质性；同朱熹的道在物先、理在事先的唯心主义观点相对立，提出“道在物中”的唯物主义命题；反对理学家的唯心主义认识路线，主张“因事作则”，即从具体事物中引出规律性的东西。揭露和痛斥理学家空谈心性给社会带来的危害，大力提倡“实事实功”——地主阶级的功利主义，强调“功到成时，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认为事功和道德义理不是对立的而是一致的。批判朱熹所谓三代以上是“天理

流行”的“王道”，三代以下是“人欲横流”的“霸道”的历史退化论，认为整个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不能说一代不如一代。但他的“天道六十年一变”的历史观则是唯心的，对王安石变法也有错误的认识。

## 叶 适

叶适(公元1150——1223年)，字正则，号水心，浙江永嘉人，南宋唯物主义思想家，理学的反对派。著作有《叶适集》。叶适对南宋统治者的腐败无能深为不满，要求改革政治、经济、军事；痛斥秦桧等人的妥协投降路线，坚持主张抗击金人侵扰，收复失地，亲自参加过抗金战争。哲学上，认为“夫形于天地之间者，物也”，肯定世界是物质的，而“物之所在，道则在焉”，“道在于器”，即道理不能离开事物。并说：“凡天下之可言者，皆‘两’也，非一也”，指出所有事物都有对立面的矛盾，具有辩证法因素。他反对“专以心性为主”的唯心主义理学，强调“学必待习而后成”，主张学与思相互为用，即要感性知觉和理性思维并重，认为“内外交相成”，才能获得知识。指斥理学家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把道义和功利对立起来的虚伪性，公开主张功利主义，并提出应“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反映了发展工商业的要求，在当时是有进步性的。他还肯定了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和“汉因秦制”的法治路线，表现出尊法反儒思想。但他对理

学的斗争不及陈亮坚决，思想上还有较多的儒家的影响。

## 事功学派

南宋进步思想家陈亮和叶适，主张用法家富国强兵的功利之学，取代理学家祸国殃民的义理之学，因此称为“事功学派”。他们的思想较多地反映了当时工商业者的利益，有一定进步作用。

## 红巾军起义

元末1351年爆发的农民大起义。起义军提出“天遣魔军杀不平”，“杀尽不平方太平”等战斗口号，反映了农民废除封建剥削制度和封建特权，实现平均、平等理想的要求。对理学家“存天理，去人欲”的反动说教进行了武器的批判。这次大起义终于推翻了元朝的残暴统治。

## 王守仁

王守仁（公元1472—1528年），字伯安，又称王阳明，浙江余姚人，明代“大儒”，宋明理学“心学”派的代表人物，镇压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起义的刽子手。政治上，大搞尊儒反法，尊王贱霸，扯起儒家反对功利主义的破旗，向法家学说猖狂进攻。哲学上，继承并发挥陆九渊的观点，认为人心是宇宙的本体，万物的主

宰，“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把自然和人类社会的一切事物及其准则以至各种道德规范，都说成是心所派生的，离开了“心”，天地万物就不存在了。这是彻头彻尾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唯我论。由此又提出“心外无学”，宣扬唯心论的先验论，把封建伦理道德（即所谓“天理”）说成是人心所固有的东西——“良知”，提倡“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的心学，妄图从人心深处压制人们的所谓“邪念”，以维护孔孟之道和日益腐朽的封建统治。王守仁在总结他残酷镇压农民和少数民族起义的反革命经验教训时曾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他的一套“格心”之学，就是用来为“破心中贼”服务的，也即在暴力镇压人民的同时，要在人心中加上一条精神锁链，用心是极其险毒的。因此，王守仁的“心学”一直受到反动统治者的赏识，独夫民贼蒋介石也曾对之顶礼膜拜。

## 致 良 知

王守仁鼓吹的唯心主义先验论。他继承和发挥了孟轲的“良知”说，把“三纲五常”等封建道德——即所谓天理，说成是人们心中先天就有的“良知”。人们只要不断反省内求，去掉“人欲”的蒙蔽，克服违反“三纲五常”的念头，就能把“良知”充分发挥出来，而成为“圣人”。这就叫“致良知”。而只要“致吾心良知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就是说，把封

建道德用之于客观世界，客观世界也就完全符合封建道德的规范了。王守仁妄图用这种先验论和反革命的修养经扼杀人民的造反思想和行动，让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制度永远保持下去。

## 知 行 合 一

王守仁提出的主观唯心主义知行观的命题。他的所谓“知”与“行”，是与唯物论者所说的“知”与“行”根本不同的概念。他举例说，譬如人见到美色就欢喜，闻到臭味就厌恶，这见到美色和闻到臭味就是“知”，感到欢喜和厌恶就是“行”。可见他所说的“行”，只是人心头的意念，并没有实践活动；因而所谓“知行合一”也就是把知和行统一于内心的活动，在自己的心中去求理，达到内心直觉的合一。这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认识论，与辩证唯物主义的知行统一观毫无共同之处。王守仁说：“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种，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却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心中，此是我立言宗旨。”这清楚地说明，他提倡“知行合一”，用意是防止人民心中有“不善”的念头发生，即企图从动机上克制人民反抗封建统治的思想，其反动性非常明显。



## 罗 钦 顺

罗钦顺（公元1465—1547年），字允升，号整庵，江西太和人，明代唯物主义者。主要著作有《困知记》。他认为气是世界的本原，天地万物都由气所派生，而理则是气的变化发展的一定的条理。提出“理只是气之理”的唯物主义观点，驳斥了程、朱把理说成是可以离开气而独立存在并永恒不变的唯心主义谬论。坚持反对王守仁的“良知”说。但他并不反对封建伦理道德，在认识论上受程、朱影响很深，也未摆脱唯心主义。

## 王 廷 相

王廷相（公元1474—1544年），字子衡，河南仪封人，明代唯物主义哲学家。主要哲学著作有《雅述》和《慎言》。他针对理学家把“理”当作世界本原的唯心主义谬论，认为世界是由物质性的“元气”构成的，“元气之上无物、无道、无理”，“理”存在于事物之中，而不是存在于事物之外，揭穿理学家“理生气也”的说法不过是老庄“道生天地”的翻版。他否认有超于自然界的主宰，反对儒家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他还认为没有永恒不变的“理”，“理”随“气”的变化而变化，对程、朱客观唯心论和董仲舒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观点持批判态度。由此出发，他认为

社会历史也是进化的，主张要变法，“因势以求治”，批判保守派儒家，肯定法家的变法革新，认为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政治制度，“行于前者不能行于后，宜于古者不能宜于今”，表现了一定的尊法反儒思想。认识论上，他反对先验论，认为人的知识不是先天就有的，强调要获得知识必须有“实历”，即有亲身实际的经历。但他的唯物主义思想是不彻底的，如不敢否认圣人“生知”，吹捧孔丘，宣扬历史是由少数“才智之雄”所创造的唯心史观。

## 张 居 正

张居正（公元1525——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湖北江陵人，明代地主阶级革新派政治家，尊法反儒的思想家。他在明神宗时执政十年，为要挽救封建统治的危机，推行法家路线，在政治上进行一些整顿和改革，收到一定效果；哲学上也有一些朴素唯物论和朴素辩证法思想。他的著作被汇编为《张文忠公全集》。

张居正认为世界是阴阳二气运动变化，自然生成的，反对有神论和“分定于天”的天命思想，提出“天下之事”“行之贵力”，强调人为的努力。注重“实效”，反对“虚谈”，反对王守仁心学派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并认为事物是可以转化的，“天下事以为无足虑，则必有大可虑”，应防患于未然，“不待其盛而亟反之”。肯定历史进化论观点，主张厚今薄古，“随时

制宜”，反对复古倒退。他充分肯定秦始皇等法家人物的历史功绩，继承法家传统的耕战政策，讲求富国强兵之术，限制豪强大地主的兼并；并在东南沿海地区开始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情况下，主张“厚农而资商”“厚商而利农”，即要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扶助工商业。

作为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张居正不可能彻底反儒，他镇压起来造反的人民，扼制不利于封建统治的进步思想，他的思想也有不少自相矛盾之处。尽管如此，他的变法改革还是遭到官僚大地主的拚命反对，他死后不久就被抄了家，这表明直到明代后期尊法反儒与尊儒反法的斗争仍是非常激烈的。

## 重“实效”

张居正的唯物主义思想观点。他主张以行动实效作为检验认识真伪的标准，提出要“扫无用之虚词，求躬行之实效”，“实事求是，而不采虚声”。由此出发，他反对空谈心性仁义，提倡富国强兵。在用人方面，主张“一以功实为准，毋徒眩于声名，毋尽拘于资格”，即重实不重名，反对论资排辈。

## 王 艮

王艮（公元1483——1540年），字汝止，号心斋，江苏泰州安丰场（今江苏东台县安丰镇）人，明代后期接近下层人民的进步思想家。他的著作被辑为《王心斋

先生遗集》。王艮出身于煮盐的灶丁家庭，终身是个平民。他虽曾跟随王守仁学习，但背离师说，吸取王学中某些思想资料，用自己的立场观点给予新的解释。他反对把“道”和“理”神秘化，提出“以百姓日用之道为本”的思想。认为老百姓的日常活动就是道，有田耕，有工做，有饭吃，有衣穿，就是道，就是真理；凡不能解决人民生产、生活问题的就不是学问，不是真理。他反对王守仁“以手足捍头目”，即牺牲人民的利益来维护统治者利益的反动主张，提出安身之学，强调要求得各人自身的生存。王艮思想反映了广大农民和小生产者的愿望，但也有严重弱点，如对统治阶级存在幻想，宣扬阶级调和论的观点，客观上起着麻痹人民革命斗志的作用。

## 泰州学派

王艮（江苏泰州人）开创的一个学派。它的特点是比较接近下层人民，反映了农民和小生产者的若干愿望和利益。王艮的弟子很多，包括农夫、樵夫、陶匠、灶丁等各阶层人物。泰州学派的颜山农、何心隐（梁汝元）等人，发挥王艮思想的积极面，关心群众的利益，并进而反对明朝封建政府的专制统治，因而受到反动统治阶级的严重迫害，他们的著作被视为“异端”加以禁止。

## 李 贽

李贽（公元1527——1602年），号卓吾，福建晋江人，明末杰出的尊法反儒进步思想家。主要著作有《焚书》、《藏书》等。

李贽从他的政治革新思想和历史发展观出发，高举尊法反儒的战斗旗帜，对历史上备受儒家诽谤、攻击的法家代表人物，一一进行翻案，给予充分的肯定；特别热烈赞扬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历史功绩，称之为“掀翻一个世界”的“千古英雄”。他把批判矛头直指儒家祖师爷孔老二，揭露孔丘“无学术以授门人”，破除对孔丘的迷信，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他指斥儒家的经书“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藪”；说那些“一步一趋，舍孔子无足法”的假道学、伪君子是“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zhì音治，猪）”。他激烈反对宋明理学家“存天理，去人欲”的反动说教，发挥王艮“百姓日用即道”的观点，认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不能解决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问题，就谈不上什么人伦道德；并且批判了儒家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的思想。但他否认是非有客观标准，主张以自己心中的是非为是非；认为“人必有私”，把自私自利看作普遍的人性；还有唯心主义和佛教的影响，是他思想中消极落后部分。

李贽的思想反映了当时市民阶层若干利益的要求。

在理学盛行之下，他以“与百千万人作对敌”的反潮流精神，大胆肯定法家，猛烈抨击儒学，是对反动腐朽的封建统治的强力冲击。明政府最后加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将其逮捕下狱，李贽不堪侮辱，自杀而死。明清两代都将他的著作列为禁书，把他的思想视为“异端之尤”，但这并不能完全制止李贽思想的传播，李贽的反封建思想还是发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 《焚 书》

李贽的重要著作。因作者估计此书一定会遭到反动统治者“焚而弃之”，故定名为《焚书》，包括书答、杂述、读史论文等，共六卷。另有《续焚书》五卷。作者对孔孟之道进行猛烈的批判，把反动统治阶级尊为“圣人”的孔丘，斥之为“无学术以授门人”，“亦庸众人类也”，根本不承认儒家经典是“万世之至论”。对于道学家“男人之见长，女人之见短”的男尊女卑的谬论，认为是不值一驳的胡言。特别是对于当时道学家的虚伪面目进行一针见血的揭露，认为他们是“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的两面派、伪君子。同时，《焚书》中也反映了作者认为天地万物是由“阴阳二气”生成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

### 《藏 书》

李贽的重要著作，共六十八卷。作者自言：“此书

但可自怡，不可示人，故名曰藏书也。”内容记载和论述自战国至元代的历史人物约八百人。另有《续藏书》二十七卷，记载明代历史人物约四百人。作者以“与百千万人作对敌”的反传统精神，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揭露了道学家虚伪狡诈的反动本质。对历史上法家人物大多给以肯定的评价，对农民起义领袖有所同情。如称陈胜起义是“匹夫首倡”；赞扬李悝、吴起、商鞅、韩非等人的变法革新精神，称秦始皇为“千古一帝”。同时，猛烈抨击孔丘“无学无术”，孟轲“舛谬不通”，董仲舒是“章句之儒”等等。对程朱理学“存天理，去人欲”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反动说教，也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 利 欲 说

李贽在反儒斗争中提出的一种关于人性的论点。他反对宋明理学家用以掩盖地主阶级自私贪婪的本性、摧残劳动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所谓“存天理，去人欲”的反动说教，认为人是不能无欲的，公开提出“人必有私”，“虽圣人不能无势利之心”的命题。指出，孔丘也说过“富与贵是人之所欲”，故“谓圣人不欲富贵，未之有也”。李贽的利欲说，揭露了从孟轲以来到宋明理学家只讲义理不谈功利的虚伪性和反动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人民对物质生活的要求，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但他不懂得功利和人性的阶级实质，把自

私自利说成是人类普遍的本性，则是十分错误的。“人必有私”的观点与共产主义世界观更是水火不相容的。

## 李自成起义

明朝末年的一次农民大起义。李自成(公元1606——1645年)，陕西米脂人。1629年率众起义，在农民革命战争过程中，提出“均田免粮”的战斗纲领，实行“除暴恤民”、“割富济贫”、“平买平卖”等革命政策。这就是要满足人民的生活欲望，否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地主剥削农民的“合理性”，对“存天理，去人欲”的理学思想作了勇猛的冲击。起义军打到曲阜和嵩县时，镇压了对抗起义的孔丘、程颐后裔，烧毁了嵩县二程祠和二程书院，把宋明以来孔门信徒表彰二程的石碑统统砸烂，表现了起义农民对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的强烈仇恨和极端蔑视。1644年起义军在西安建立了大顺革命政权，不久攻克北京，推翻了明王朝。这次大起义虽然最后失败了，但它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推动了社会历史的发展。

## 黄宗羲

黄宗羲(公元1610——1695年)，字太冲，号南雷，又号梨洲，浙江余姚人，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想家。著有《明夷待访录》、《南雷文集》、《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等书。



黄宗羲提出“理根于气”、“无气则无理”的唯物论命题，认为物质的“气”是“理”的根源，反对“理生气”的唯心论。他还主张“工商皆本”，反对传统的“农本商末”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工商业发展的要求。

黄宗羲思想的杰出贡献在于他猛烈抨击了反动理学的“君为臣纲”的说教，指出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把天下当作一家一姓的“产业”，“屠毒天下之肝脑”，“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已成为“天下之大害”，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思想，主张为公立法，实行法治。

黄宗羲的具有一定民主色彩的进步思想对我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产生过一定的积极影响。但他只是要求对君主制作某些改良，推行“贤人之治”；哲学思想的某些方面陷入了孟轲、王守仁一类的唯心论先验论。

### 《明夷待访录》

黄宗羲的主要著作。一卷，有《原君》、《原臣》、《原法》等二十一篇。书中大胆揭露和痛斥封建君主专制的毒害，指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要求改变“以君为主，天下为客”的状态，变封建君主所立的“一家之法”为“天下之法”，并提出“工商皆本”的主张，反对“农本商末”的传统观点。《明夷待访录》无异于一篇反对理学的政治宣言，反映了市民层的

利益和要求。清乾隆间列为禁书。对我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产生过一定的积极影响。

## 顾 炎 武

顾炎武（公元1613——1682年），江苏昆山亭林镇人，又称亭林先生，明清之际尊法反儒进步思想家。著有《天下郡国利病书》、《日知录》、《亭林诗文集》等书。认为“盈天地之间”的是物质的“气”，反对理学家的唯心论。主张“众治”，反对君主“独治”。他着重批判了唯心主义理学高谈“明心见性之空言”的脱离实际的学风，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就是要研究“国家治乱之原，生民根本之计”的学问，要“引古筹今”，主张凡是与“当世之务”无关者，“一切不为”。

## 王 夫 之

王夫之（公元1619——1692年），字而农，号薑斋，湖南衡阳人，明清之际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因晚年在衡阳的石船山下土屋里从事著述，又被称为船山先生。著作有《张子正蒙注》、《读通鉴论》等一百多种，编为《船山遗书》。

在政治上，他提出“推故而致新”“平天下者，均天下而已”等观点，主张改革腐朽政治，限制大地主垄断土地。社会历史观方面，反对儒家鼓吹的历史循环论

和“泥古过高而非薄方今”的今不如昔论，认为历史是“顺必然之势”而向前发展的，从而肯定秦始皇废分封立郡县是顺应了“势之所趋”而“行其大公”的壮举。

王夫之的突出贡献是在哲学思想上继承前人成就而建立了超过前人的唯物主义体系，把我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他坚持“理在气中”的唯物论观点，反对鼓吹“理在气先”的程、朱唯心主义；坚持“道不离器”、“道依于器”的唯物论观点，反对“道本器末”的唯心论；坚持“知必以行为功”的唯物论知行观和“学以致知”的反映论，清算了朱熹“知先行后”和王守仁“知行合一”的先验论知行观。

王夫之的思想反映了当时地主阶级革新派和若干市民阶层的要求，具有鲜明的进步性。但他幻想调和、改良，反对革命，蔑视人民群众，他的哲学思想也还有一些唯心论杂质。

### 理在气中，道不离器

王夫之的唯物主义理气论和道器论。认为世界的本体不是精神性的“理”，而是物质性的“气”，而且物质是永存不灭的；“理在气中”，“理”是“气”的运动变化的“条理”即规律性。所谓“器”，是指客观存在的各种具体的物质性东西，“道”是具体事物的规律，没有事物，就不存在事物运动的规律，所以“道不离器”。“器日尽，而道愈明”，即随着事物向前发展，

它所表现的规律也就愈明显易见。王夫之的唯物主义理气论和道器论，有力地批驳了程、朱理学“理在气先”、“离器言道”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观点。

## 静者静动

王夫之关于物质运动的绝对性的光辉命题。他认为动和静的关系是辩证的，“静者静动，非不动也”，“静即含动，动不舍静”，就是说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天地生物，其化不息”，万物始终处于不断运动之中，并从而阐述了“道日新”、“质日代”的发展变化观点。

## 知必以行为功

王夫之的唯物主义知行观。他认为知和行的关系应该是以行为基础，“知必以行为功”，“行可有知之效”，即认识必须付诸实践，通过实践可以取得正确的认识。指出朱熹的“知先行后”论是“离行以为知”，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论是“销行以归知”，都是否定“行”的谬论。但在实践的社会性和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关系问题上，他还没有脱出旧唯物论的局限。

## 颜元

颜元(公元1634——1704年)，又名习斋，字易直，河北博野人，明清之际唯物主义进步思想家。主要著作

有《四存篇》、《习斋纪录》等。

颜元在同理学作斗争中，坚持朴素的唯物论的反映论，反对唯心论的先验论，倡导“经世致用”之学，反对“空疏无用”之学。驳斥程、朱“理在气先”的谬论，指出“理在事中”，强调实践的重要性，认为要正确认识客观事物，必须“践履”，“力行”，要“身实学之，身实习之”，做到“习事见理”。由于他认识到“思不如学，而学必以习”，因而改名习斋。他批判宋儒“空口讲诵，静坐冥想”的脱离现实的治学方法，尖锐地指出，“绝事离群，以求治心”，“率天下入故纸堆中”，其结果，“读书愈多，愈惑，审事愈无识，辨经济愈无力”。他反对董仲舒之流“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反动说教，提出了“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的反命题，认为功利和道义是一致的，从而揭露了儒家空谈仁义的欺骗性，表现出尊法反儒思想。他还揭露了由于大地主阶级无限制地兼并土地而造成“一人而数十百顷，或数十百人而不一顷”的严重情况，主张“均田”，幻想通过井田制的形式解决土地过于集中的问题。

颜元的学说在当时发生了相当广泛的积极影响，曾受到理学卫道者的咒骂和攻击。但他讲的“践履”、“力行”是以“经济事业”和个人生活作事等为主要内容，仍未脱出旧唯物论的局限。他的“均田”思想也是为了挽救封建制度日益严重的危机。

## 戴 震

戴震（公元1723——1777年），字东原，安徽休宁人，清代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主要哲学著作有《孟子字义疏证》、《原善》等，均编入《戴氏遗书》。

在物质与精神的关系问题上，戴震肯定世界的本质是物质性的气，而且“气化流行，生生不息”，物质不断地在运动、变化、发展；认为物质的运动、变化、发展是有规律的，总的规律叫做“道”，各个具体的物质运动的特殊规律叫做“理”或“分理”；各种外在事物作用于人的感官，产生感觉；在感觉基础上，经过思维加工，“心通其则”，可以达到对事物规律（也就是“道”和“理”）的认识。戴震以这些朴素唯物论观点有力地批驳了儒家理学的“理在事先”、“理具于心”的唯心论先验论。

戴震还从朴素唯物的感觉论和“理在事物之中”的观点出发进一步提出了“理存乎欲中”的理欲观，肯定人们追求正当利益的欲望有理，痛斥程朱“去欲存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反动说教。他尖锐地指出，理学是镇压、迫害人民的工具，是“以理杀人”。这些批判，反映了戴震对封建统治者的不满和对人民某种程度的同情，富有唯物主义战斗精神。但是戴震的思想同样具有一切旧唯物论的局限，还有英雄史观、人性论等糟粕。

## 道主统 理主分

戴震提出区分“道”与“理”的关系的唯物主义观点。他把“道”理解为物质运动、变化、发展的普遍规律，事物的共性，所以说“道主统”。把“理”看作是各个事物的特殊规律，事物的个性，所以说“理主分”。他强调“分”，就是要人们深入研究事物的特殊规律，认识和掌握各个具体事物自有的条理——也叫“分理”，认为“事物之理，必就事物剖释至微而后‘理’得”。这是戴震哲学的创见，反映了十八世纪我国自然科学的发展水平。但戴震并不理解两者的辩证关系——共性寓于个性之中。

## 理存欲中

戴震在批判程、朱理学“去欲存理”“以理禁欲”的反动说教时提出的唯物主义理欲观。他认为人之“有欲”是自然现象，“有欲而后有为，有为而归于至当不可易之谓理，无欲无为，又焉有理？”就是说，有欲望才有作为，人的正当欲望和要求是合理的，“理存乎欲中”，不能离开人们的生活要求而空谈“理”。他指出“去欲存理”一类观点对于人民大众是“残杀之具”，使“天下国家受其祸”。但他不懂得不同阶级有不同的欲望和要求，说什么“人之同欲”，则是错误的。

## 七

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由鸦片战争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近八十年，属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斗争及其尖锐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英勇斗争的历史。这个斗争，在哲学战线上也表现得空前激烈和尖锐。

由鸦片战争开始的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加深了封建社会的危机，在人民大众中产生了反对国际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思想；地主阶级的改革派龚自珍、魏源等人则以唯物论的反映论和历史进化观反对唯心主义理学，倡导“经世致用”之学，要求变法。

1851年爆发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战争，形成近代史上第一次革命高涨。它的杰出领袖洪秀全以及洪仁玕，集中农民阶级的利益、要求和智慧，提出平等平均思想，同以曾国藩为代表的维护地主买办阶级利益的唯心主义理学，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太平天国革命沉重地打



击了清封建王朝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也对孔孟之道进行了一次规模空前的大扫荡。

在中国社会进一步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化过程中，伴随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初步发展，从官僚、地主、商人中逐步分化出新的阶层——资产阶级的改良派，他们发动了1898年的戊戌变法运动。改良派的代表康有为、严复、谭嗣同等，吸取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观点，并继承古代法家进步传统，尊法反儒，揭露和批判封建顽固派和洋务派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谬论，阐发了主“变”的哲学观点。

1900年的义和团农民革命战争，是近代史上第二次革命高涨，它结束了单纯的农民战争的历史时期，推动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高潮时期，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领导了革命派对改良派的一场大论战，并开展了批判封建迷信和以孔教为国教的斗争。在斗争中，章炳麟坚持了唯物论无神论和尊法反儒思想。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共和国，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决定了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他们在理论上也是贫乏的。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历史揭开了新的篇章，进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 龚自珍

龚自珍(公元1792——1841年)，字璣(sè瑟)人，号定庵，浙江仁和(杭州)人，近代尊法反儒思想家，地主阶级改革派，近代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运动的先驱者。著作编为《龚自珍全集》。

在封建社会危机日益加深情况下，龚自珍倡导“更法”，提出禁绝鸦片，反对外国入侵的主张和改革科举吏治、限制土地兼并等要求；肯定先秦法家的厚今薄古和变法思想，认为“六经皆史”，“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反对把儒家经书作为万古必遵的法典，提倡符合现实需要的“经世致用之学”。在哲学上，批判“天命论”，主张“非命”，提出天地“非圣人所造”，而是“众人自宰”的命题；批判先验的“性善”、“性恶”论，认为人性的善恶都是后天形成的；批判名实分裂，主张名(概念)实(事物)一致，反映了萌芽中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的思想倾向。但他的目的是在旧的封建制度上进行某些改良，进步思想与封建思想糟粕杂糅一起，在不少方面陷入二元论。

### 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

龚自珍的一种厚今薄古治学观点。他认为一个时代的学术与该时代的统治是统一的，提出“六经皆史”的观点，认为儒家“经书”只能做为历史来研究，而不能

作为万世必遵的法典。从而强调“颂本朝之法，读本朝之书”，反对颂古非今，提倡从现实社会需要出发的“经世致用”的研究方法。

### 三元里平英团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广州的人民抗英武装组织。1841年5月30日，广州三元里人民群众自动组织起来，痛击英国侵略军，取得伟大的胜利。他们在反对国际资本主义侵略和反对封建统治者卖国投降的斗争中体现了唯物论的反映论，认识到英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蓄意已久”，这是其“贪凶性”的本性决定的，这种“贪凶性”又决定了它对我国的侵略总是“得寸进寸，得尺进尺”，不会中止。通过抗战实践，也认识到资本主义侵略者具有“脆弱性”的一面，认识到劳动人民力量的伟大，“荷锄之农夫，操戈御敌”，侵略者是可以被打败的。

### 魏 源

魏源（公元1794—1856年），字默深，湖南邵阳人，近代尊法反儒进步思想家，地主阶级改革派。曾亲自参加抵抗英国侵略者的第一次鸦片战争。著有《海国图志》、《圣武记》等。

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历史条件下，魏源批判闭关自守的保守思想和崇洋卖国谬论，注意研究外国情况，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要求学习资本主义

国家的“长技”，抵抗资本主义侵略者。坚持历史发展观，反对复古倒退论，提出“变古愈尽，便民愈甚”的论点，主张变法革新，求国家富强。他认为“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乌有不行而能知者乎”，以唯物论的认识论批判了儒家唯心论的先验论，倡导“经世致用”的“实学”，提出“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的原则，即改革要从实际出发，讲求实际的效果。他并提出“天下物无独必有对”的具有辩证法因素的观点。他驳斥了地主阶级顽固派把近代机器生产说成是“奇技淫巧，坏乱人心”的谬论，主张建立近代工业，允许民间自由设厂，反映了发展中国民族工商业的要求。魏源的这些思想，成为后来维新变法的改良主义思想的先驱。但他毕竟是地主阶级的思想家，哲学上往往陷入二元论，并曾反对太平天国革命。

### 天下物无独必有对

魏源的具有辩证法因素的观点。他看到事物变化发展中充满着对立矛盾，指出“天下物无独必有对”，并且“有对之中，必有一主一辅，则对而不失为独”。就是说，在一对矛盾之中，又有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区别。但当他说明君臣、父子、夫妇等社会现象时，却把矛盾的主次方面固定下来，否定矛盾可以转化，陷入了形而上学。这也是他的地主阶级立场决定的。

## 变古愈尽，便民愈甚

魏源的历史发展观和变法思想。他说“势则日变而不可复者也”，认为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总是进化的，绝不应违反这个趋势而搞复古倒退。并且提出“变古愈尽，便民愈甚”，即对旧制度改革愈彻底，也就愈有利于人民。这反映了他变法图强抵御外侮的迫切愿望。但他的变革思想并不是要推翻封建制度，而是为地主阶级改革派政治路线服务的。

## 林 则 徐

林则徐（公元1785——1851年），福建侯官人，鸦片战争时期地主阶级中抵抗派的代表。1839年，在人民群众斗争的支持和鼓舞下，他在广州坚决查禁鸦片烟和抵抗英国资本主义侵略者，表现了一定的民族爱国思想。通过斗争实践，他认识到外国资本主义“利心不死”，“性贪而狡”，总是“反复无常”，“欺弱畏强”；认为“民心可用”，断定人民反抗“足以制其命而有余”，即完全足以打败侵略者。林则徐从抵抗侵略进而主张政治改革。他在因抗战获罪被流放新疆期间，主持兴办水利、开垦农田，传播内地先进生产技术等，致力于发展边疆经济，巩固西北边防。他意识到沙俄殖民扩张的严重威胁，曾大声疾呼：“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但作为地主阶级政治家，他是敌视农民起义的。这是他

阶级的局限性。

## 太平天国革命

洪秀全领导的反抗国际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的伟大农民革命战争，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序幕。起义于1851年1月11日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爆发后，建立了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政权，1853年3月攻占南京，定为都城，改称天京。太平天国继承和发展了过去农民战争中关于“均贫富，等贵贱”，“均田、免赋”的思想，在革命实践中提出了政治、经济、男女、社会四大平等的一整套主张，掀起了声势空前浩大的讨孔运动。革命军所到之处，砸毁孔庙，焚毁儒家经典，出现了“敢将孔孟横称妖，经史文章尽日烧”的革命景象。他们以具有辩证法因素的“革故鼎新”的天道观批判儒家宣扬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天道观，提出“人为贵”和“物必改而更新”的思想，相信经过革命斗争，社会可以从“暗”变“光”，从“乱”变“治”。同时，坚决批判孔孟信徒曾国藩等人“引鬼入邦”的卖国路线，在战场上多次沉重打击外国侵略者。1864年天京被攻陷。太平天国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在近百年来中国人民战争史上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和不可磨灭的功绩。

## 洪 秀 全

洪秀全(公元1814——1864年)，太平天国农民革命

的杰出领袖。广东花县人，出身农民家庭，是同贫苦农民有密切联系的乡村知识分子。他集中地反映了贫苦农民阶级的利益、要求和智慧，领导亿万劳动群众走上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并从理论上和行动上对唯心主义理学的核心“三纲五常”进行了空前猛烈的批判和冲击。为了打破“神道”的权威，他提出了以平等观为内容的所谓“皇上帝”的权威，反对一切阻碍革命、为封建专制制度服务的神道——阎罗妖至城隍庙等神权。他坚信“乱极则治，暗极则光，天之道也”，立志改变现实社会“乱极”“暗极”的不平等现象。为了打破“圣道”的权威，他高举反孔大旗，批判孔孟之道，删改儒家经书，对维护半封建半殖民地利益的封建文化进行了革命的扫荡。作为革命农民的代表，他提出了《天朝田亩制度》这个体现了平等平均思想的农业方案，把中国历代农民战争和农民革命思想发展到最高峰。正是在洪秀全的农民革命政治路线和革命思想的指引下，太平天国革命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势力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动摇了封建统治的基础，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

### 《天朝田亩制度》

太平天国的彻底反封建制度的革命纲领。它从政治上肯定了“人人平等，男女平等”；提出“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的“无处不均匀，无

人不饱暖”的经济平等原则，规定“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并规定实行一种名为“圣（国）库制度”的供给制度，不承认有私有财产。这个伟大文献，是对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否定，也是对宣扬剥削压迫有理的孔孟之道的彻底批判，是中国历代农民战争和农民革命思想发展的高峰。虽然它提出的分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绝对平均主义原则只是一种空想，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却是一种进步的、革命的思想。它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劳动群众参加革命斗争的积极性，使革命得到空前广泛和深入的发展。

### 乱极则治，暗极则光

洪秀全提出的革命的天道观。他揭露和谴责反动腐朽的封建统治是“乱极”、“暗极”，指出“乱极则治，暗极则光，天之道也”。这种事物终将向对立面转化的辩证思想，是对“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儒家形而上学天道观的批判。它是为太平天国革命决心推翻封建统治，实现一个“治极”“光极”的新世界的理想服务的。

### 洪 仁 玕

洪仁玕(公元1822——1864年)，太平天国革命后期的领导人之一，洪秀全的族弟。他和洪秀全具有共同的革命立场和世界观，从1859年起总理太平天国朝政。他提出“革故鼎新”的具有辩证思想因素的天道观，论证



了用农民革命政权取代封建统治，实现“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理想的合理性。在经洪秀全批准、作为太平天国官书颁行的《资政新篇》中，他提出二十八条“以资为政”的措施意见，主张在巩固农民政权的基础上搞一点近代工业交通运输的建设，并改革某些制度和社会风尚。1864年天京陷落后，他在江西被俘，宁死不屈，英勇就义。他在留下的《洪仁玕自述》中，指出革命之所以失败，在于“洋人助妖”——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联合清封建统治者共同绞杀了革命。这是深刻的历史经验的总结。

## 革 故 鼎 新

洪仁玕提出的天道观和政治观。他说：“衣必洗而垢去，物必改而更新，理之自然者也。”从而论证了政治上“革故鼎新”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他强调由“故”到“新”的关键在于“革”，这就从理论上阐明了必须通过斗争来实现社会变革的要求，是具有辩证法因素的光辉思想。

## 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

洪仁玕提出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理想。他用这个理想来教育和动员劳动人民坚持革命武装斗争，彻底推翻封建统治，扫荡孔孟之道，努力巩固农民政权；并要求在农民政权基础上发展近代工业和改革某些制度。他

还指出，人们只有站在革命立场上，才能正确对待新生事物，“始能认识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的理想，否则将会错误地认为“新不如旧”。

## 曾 国 藩

曾国藩(公元1811——1872年)，湖南湘乡人，清代反动理学头子，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刽子手，汉奸卖国贼。他以孔孟道统的继承人自居，在纠集地主反革命武装，勾结外国侵略者，疯狂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过程中，拚命贩卖儒家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和英雄史观，扯起唯心主义理学的破旗，对太平天国的反封建思想大肆诬蔑和攻击。他叫嚣“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面对太平天国的反孔怒涛，哀叹“士不能诵孔子之经，举中国数千年来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他大讲“诚”的唯心主义哲学，把本属道德范畴的“诚”说成是物质世界的主宰。鼓吹“立诚”，即以主观的“诚”去体验先天固有的封建道德理念。他企图把“诚”作为整个地主阶级的反动精神支柱，并用以掩盖自己残忍严酷、贪得无厌的地主买办阶级的反动本性，打着“以至诚相与”的招牌，讨好外国侵略者，崇洋卖国。曾国藩及其“诚”的哲学，曾为后来的反动统治者所大肆吹捧，特别受到了蒋介石的顶礼膜拜。

##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在中国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化过程中，伴随着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初步发展，从官僚、地主、商人中逐渐分化出一个新的阶层——资产阶级的改良派。他们为救亡图存，要求维新变法，主张变封建专制为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政体，幻想在不废除封建制度的基础上进行某些资产阶级性的改良，以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为此，他们举起尊法反儒的旗帜，在哲学战线上揭露和批判为封建买办政权服务的唯心主义理学和“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揭示和阐发了变化观点，并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庸俗进化论。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的萌芽、发展以至走向没落的时期，以1898年康有为领导的戊戌变法运动为最高峰。此后，由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逐步成长壮大，革命的民主思想代替了改良主义思想。

## 戊戌变法

1898年(戊戌)由康有为领导的一次由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又称戊戌维新。在清光绪帝载湉的支持下，变法实施一百零三天，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地主阶级顽固派的镇压。在变法的准备和推行过程中，资产阶级改良派翻译和介绍西方资本主义革命时期的一

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著作，如达尔文（英国）的进化论、卢骚（法国）的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等，并继承中国历史上法家变法革新的思想，广泛开展宣传活动。他们提倡资产阶级的“新学”、“西学”、“学校”，对代表封建主义的“旧学”、“中学”、“科举”的儒家正统思想进行斗争，形成近代知识界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高潮，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一定进步意义。但这次变法运动主要是代表一部分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官僚地主的利益，具有很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派只承认渐变，否定突变，要改良不要革命；相信“圣”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只靠皇帝不靠人民；不能同孔孟之道决裂，反儒而不批孔；这就决定了运动的必然失败。随着时代的前进，当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兴起时，康有为等人仍坚持改良主义路线，便从改良派堕落为“保皇派”、复辟派，成为阻碍历史前进的反动派了。

## 康 有 为

康有为（公元1858——1927年），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县人，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戊戌变法运动的领导者。主要著作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大同书》。他借用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提倡“主变”哲学，认为：“物新则壮，旧则老；新则鲜，旧则腐；新则活，旧则板；新则通，旧则滞；

物之理也。法既积久，弊必丛生，故无百年不变之法。”并指出“其变力大者其治功大”。同时宣扬“三世说”，作为维新变法的理论根据之一。还写了《大同书》，提出带有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学说。但他否认突变，幻想调和矛盾，鼓吹英雄史观和“博爱哲学”——否定阶级斗争的泛爱主义人性论，表现出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他领导的变法运动，只是想依靠皇帝进行某些资产阶级性的改良，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统治的基础；他批判宋儒而不敢批孔。反而把孔丘说成是“托古改制”的祖师爷，企图利用孔丘的权威来抵制封建顽固势力，突出表现了从官僚地主阶级转化出来的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戊戌变法的失败宣告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破产。但此后他仍坚持改良主义路线，反对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民主革命，妄图把历史车轮拉向后转，最后堕落为被推翻的清朝“遗老”和顽固的尊孔派，成为民主革命时期的“复辟祖师”。

### “三世说”

康有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观点的理论根据之一。所谓“三世”是：“据乱世”，指君主专制；“升平世”，指君主立宪政体；“太平世”，指共产主义社会（大同世界）。康有为认为人类历史是按照这“三世”的顺序发展的，当时正处于从“据乱世”向“升平世”过渡的阶段；至于“太平世”，则是未来的理想。“三

世说”是唯心主义的虚构，但它承认社会的发展变化，反对“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不变论，借以论证维新变法的必要性，在当时有一定进步意义。

## 《大同书》

康有为的一部带有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著作。它对当时社会的不平等现象加以揭露和抨击、并指出其根源在于私有财产。但不承认现实社会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宣扬唯心主义英雄史观和资产阶级人性论，幻想由“圣人”出来拯救世界，调和阶级矛盾，建立一个“天下为公”，“一切平等”的乌托邦式的社会——所谓“大同之世”。毛主席指出：“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 谭 嗣 同

谭嗣同(公元1865——1898年)，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戊戌变法时期资产阶级改良派中的激进分子。主要著作有《仁学》。他把西方自然科学的“以太”说，和传统的唯物主义哲学相结合，提出具有唯物论倾向的泛神论的泛仁论，带有从中国古代朴素唯物论向机械唯物论的过渡性。从泛仁论出发，他提出“冲决网罗”的号召，对封建名教——纲常伦理进行猛烈抨击；批判“君为臣纲”，提出“废君统，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的创议；批判“父为子纲”，认为父子出

于自然的关系，不应“以父压子”；批判“夫为妻纲”、指出“男女同为天地之菁英”。政治上要求变法，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倾向，但他受到佛学等唯心主义思想影响，思想体系中充满矛盾。提出“心力论”，强调“贵知不贵行”，夸大了理性的作用；反对革命暴力，主张“贵中和”，企图调和和社会阶级矛盾。他积极参加了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被杀，成为此路不通的改良主义路线的殉葬品。

## 《仁 学》

谭嗣同的主要著作，共二卷，成书于1896年。谭嗣同在《仁学》中，力图将当时西欧自然科学的“以太”假说，同中国传统唯物主义哲学结合起来，建立一套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泛神论的泛仁论思想。他把“仁”既看作充满太空的物质性的“以太”，同时又是“以太”的精神表现；认为仁“以通为第一义”，象“电”一样，是四通八达的，仁和不仁的区别就在于通不通。因此他以“冲决网罗”的战斗精神，对儒家的“三纲五常”进行猛烈的抨击。他认为三纲五常“箝制”天下，杀人“灵魂”，造成“中外”、“上下”、“男女内外”和“人我”都“不通”，违反了“仁”，其“惨祸烈毒”达到极点，必须坚决打破。可见谭嗣同的“仁”的哲学是为资产阶级寻求思想解放，要求自由发展工商业的斗争服务的，带有反对封建专制和儒家唯心主义理

学的斗争意义。但他又受到佛学神秘主义思想影响，过分夸大“仁”——人的“心力”的作用，宣扬唯心主义“心力论”，是他思想中的落后方面。

## 严 复

严复(公元1853——1921年)，字又陵，又字几道，福建侯官(今闽侯)人，清末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改良主义者。他是近代史上第一个较为系统地介绍和传播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和科学思想的人，译有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等书。他吸收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和力学等自然科学思想，并同历史上法家的唯物论思想结合起来，反对宇宙神创论和天命论，世界观具有机械唯物论倾向。猛烈抨击封建文化学术，提倡“新学”、“西学”，表现出尊法反儒思想。批判儒家理学的唯心论先验论，指出它的要害是“师心自用”、“强物就我”，即随心所欲，强迫客观服从主观。政治上强调变法维新，“自强保种”，并依据西方资产阶级“天赋人权”论，主张“尊民”，“公治天下”，实际是要求资产阶级参政。严复思想在当时知识界起了积极的影响，是戊戌变法时期的先进人物。但他否定“突变”，反对革命，看不起人民的力量，并陷于不可知论的唯心论。后来也和康有为一样顽固坚持改良主义立场，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倡尊孔读经，堕落后为阻挡历史前进的反动分子。



## 《天 演 论》

严复的重要译述著作。翻译英国赫胥黎阐述达尔文进化论的著作《进化论与伦理学》的前两章，并用法家思想加以评注而成。严复在《天演论》中以机械运动来说明物质世界的运动，从根本上批判了儒家唯心论天命论思想。同时大力阐述“变”的观点，为资产阶级变法维新提供理论根据。认为天演进化“贯天地人而一理”，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提出“尚力为天行”、“争天而胜天”的思想，指出中国如能顺应“天演”规律而实行变法维新，就会由弱变强；否则将沦于“亡国灭种”而被淘汰。这无异于在民族危机严重情况下敲起救亡的警钟，因而《天演论》为当时爱国者所重视，影响很大。但他以生物的自由竞争来代替社会阶级斗争，拿自然现象来解释社会现象，则是错误的。他不能正确区别进化论与为帝国主义辩护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界限，说明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理论的贫乏。

## “以太”

“以太”是十九世纪中期西欧自然科学家马克斯维尔提出的一种假设，认为它是存在于太空中的一种能传递光的特殊的介质（后来自然科学实验证明，“以太”的假设不能成立）。严复把这个假说介绍到中国来，他和后来的孙中山都把“以太”这个概念作为物质

来理解。谭嗣同则把“以太”作为自己的哲学的最高范畴，实际上把物质性的“以太”同精神性的“仁”看作同一东西，从而构成了他的具有唯物论倾向的“泛仁论”哲学思想。

## 体 用 一 致

严复为倡导变法维新提出的体用观。他认为要挽救国家危亡，不能只是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工业和技艺，同时必须从政治等根本方面进行改革，做到“体用一致”、“本末一致”。他批判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舍本逐末”的假新政。但严复的所谓治“本”，也只是办新式学校，给资产阶级以参政权等一套，并不要求从根本上触动封建制度的基础，还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也并不能解决问题。

## 洋 务 派

清末统治集团中由封建买办官僚组成的一派。1860年后，清政府中央以奕訢为代表，地方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代表，主张利用卖国条约取得外国援助，以加强军事装备为中心，兴办近代企业，妄图借以挽救封建统治的危机，加强对人民的镇压力量。这称为“洋务运动”。后起的洋务派主要代表是张之洞。洋务派所代表的是向买办资产阶级转化的封建官僚地主，他们和封建顽固派一样都是尊儒反法派，把尊孔与崇洋卖国结合

为一体。

## 张 之 洞

张之洞（公元1837——1909年），河北南皮人，官僚买办阶级洋务派代表，儒学卫道士。戊戌变法时期，他和封建顽固派一起，掀起尊儒反法的破旗，对资产阶级改良派所主张的“新学”、“西学”大肆诬蔑和攻击。在他炮制的臭名昭著的《劝学篇》中，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派理论，叫嚣“明纲”、“正权”、“教忠”，即要明封建道德伦常之纲，正君主专制之权，教人效忠于君王。《劝学篇》由顽固派总头子慈禧下令颁发全国，成为当时尊孔派的反动思想武器。

###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张之洞提出的洋务派的反动理论。所谓“中学为体”，是说维护封建纲常伦理的孔孟之道是根本，不能变；所谓“西学为用”，是说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可以效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搞一些军事工业和制造技术，作为加强对人民镇压的工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涂上一层买办色彩的“天不变，道亦不变”论，是为封建地主买办阶级服务的。

## 义 和 团 运 动

1900年爆发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农民革命

战争。义和团农民群众在革命斗争实践中，逐步加深了对清封建王朝剥削压迫人民及其作为帝国主义走狗的反动本质的认识，从而把开始时提出的“扶清灭洋”的口号改为“扫清灭洋”。这是符合唯物论认识论的正确反映。他们焚毁教堂，严惩欺压中国人民的洋教士，痛击帝国主义侵略军，并且烧毁清王朝最高统治者慈禧的“龙车”，发出惩办“一龙”（光绪皇帝）、“二虎”（卖国贼李鸿章和荣禄）、“三百羊”（清政府在京的反动官吏）的揭帖。这种革命造反精神，是公开向宣扬剥削、压迫有理的孔孟之道挑战。义和团农民革命运动，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者，提高了人民群众的觉悟，推动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高涨。

### 资产阶级革命派

1900年以后，在义和团农民战争的推动和影响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走向高潮。1905年，孙中山创建了第一个中国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并创办了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在发刊词中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政纲，决心为推翻清朝封建统治政权而斗争。在革命进程中，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大造革命舆论，特别是同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进行了斗争。在政治路线上，革命派坚决驳斥了改良派“保皇即革命”的谬论，指出“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

位。”并对改良派的“非暴力革命”论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指出革命就不怕“流血成河”，只有暴力革命才能推翻清封建反动政府，打破旧制度、旧事物的束缚。在思想路线上，用唯物论哲学为革命服务，极力介绍西方的无神论思想，反对天命论和鬼神迷信，提出“人事可以胜天行，天下事亦惟凭人造”的“责天”、“革天”思想。高举反孔旗帜、猛烈抨击康有为等主张以孔教为国教的反动叫嚣，批判矛头直指孔丘，指出孔学是“祸本”。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精神工具——基督教，也作了无情的批判，并揭露帝国主义侵略者“推崇孔教”是为了“利用孔子以亡中国”。革命派对封建统治思想的批判，远远超过了改良派所能达到的水平，是尊法反儒对尊儒反法斗争的深入和发展。但是，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决定了他们的唯物论思想是不彻底的，他们具有唯心主义英雄史观，看不到广大人民群众决定革命进程的伟大力量；对近代社会的基本矛盾，特别是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本质缺乏科学认识，因而虽然取得了1911年辛亥革命的胜利，推翻了封建专制制度，但终于没有也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

## 章 炳 麟

章炳麟(公元1869——1936年)，字枚叔，号太炎，浙江余杭人，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唯物论者，尊法反儒的代表。主要著作有《章氏丛书》和《章

氏丛书续篇》。他继承了历史上法家思想的进步传统，同时吸取了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思想，把两者结合起来，作为进行民主革命的思想武器。在他主持同盟会机关报《民报》期间，坚决同以康有为、梁启超为头子的保皇派作斗争，彻底批判了他们的改良主义谬论。他强调革命必须使用暴力，指出革命乃“补泻兼备良药”，只有革命才能破坏旧的，建设新的。他坚持唯物论无神论和感觉来源于客观存在的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发挥荀况“制天命而用之”的戡天思想，提出“恃革命以开民智”的光辉论点，修正了王充的自然宿命论的局限性。他还揭露帝国主义利用传教士贩卖基督教神学是“直接以上帝为其杀人、戮人之前导”。可见他的唯物论无神论，是直接为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路线服务的。

革命必须反孔。尊法反儒是章炳麟的民主革命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猛烈地批判儒家，视儒学为“蛊民之学”、“愚民”之说，揭露孔丘及其信徒的伪君子和阴谋家的反动实质；同时热情讴歌历史上的法家杰出代表，为商鞅辨诬，指出“商鞅行法而秦日富”，肯定了法家路线。辛亥革命后，为反击袁世凯为复辟帝制掀起的尊儒反法逆流，发表《驳建立孔教议》、《秦政记》、《秦献记》等文章，痛斥儒家攻击秦始皇的种种反动谬论，通过歌颂古代的“新王”——秦始皇，来歌颂当代的“新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新政体，把尊法反儒的斗争提到新的水平。

在辛亥革命时期，章炳麟“七被追捕，三人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是一个坚定的民主革命者。但他未能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前进，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既离民众，渐入颓唐”，逐步转化为保守人物，最后走上尊孔读经的旧路。这是章炳麟的悲剧，也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软弱性的表现。

## 《 脩 书 》

章炳麟早期的革命著作，最早于1899年刊行，1902年重订，增加了《订孔》等批孔新篇章。其中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历史等内容，反映了章炳麟早期的哲学、政治思想。《脩书》（脩，音求qiú，急迫的意思）在哲学思想方面，吸收了西方资产阶级的近代科学和进化论思想，在我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为接近机械唯物主义思想，在自然观和认识论方面都提出了机械唯物主义的观点。《脩书》曾经起了鼓吹革命、批判儒家理学的积极作用。辛亥革命后，章炳麟的思想转向保守，他把《脩书》修订为《检论》，将其中革命的内容和唯物主义思想大部分删掉了。

## 孙 中 山

孙中山(公元1866——1925年)，名文，字逸仙，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杰出领袖，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著作编为《中山全书》，《孙

中山选集》。他的重要哲学观点主要表现在《建国方略》的《心理建设（孙文学说）》部分中。

孙中山“在中国民主革命准备时期，以鲜明的中国革命民主派立场，同中国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批判和粉碎了康有为保皇派反对革命的改良主义谬论。1905年创立“中国同盟会”，提出三民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纲领。他把理论宣传同武装斗争结合起来，多次组织领导起义，终于在1911年取得了辛亥革命的胜利。

孙中山的哲学学说是为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服务的。他试图用当时自然科学关于“以太”的假设来论证宇宙万物的物质性，提出先有事实后有理论的观点，在自然观和认识论方面具有明显的唯物主义因素。他批判唯心论的天命论，认为社会历史是发展变化并有规律可循的，对革命充满坚定信念，强调“顺着潮流做去，纵然一时失败，将来一定成功”。但他提出的“知难行易”的理论，机械地割裂了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关系，陷入了“分知”、“分行”；他还提出所谓“生元论”和“民生史观”；就其整个哲学体系来说，是二元论或唯心论的。

孙中山的思想是在革命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伴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他的思想也力求跟上去。开始时他曾徘徊于改良主义道路，不久转变为坚定的民主主义者；在其晚年，又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提出“联俄、



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同中国共产党结成了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由一个旧范畴的三民主义者转变为新民主主义的同情者。

孙中山思想也有其阶级和时代的局限，如他对社会发展规律缺乏科学的认识，始终没有摆脱唯心的英雄史观等。这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决定了他所领导的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总归失败，而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但是，正如毛主席所指出：“象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

### 三 民 主 义

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革命纲领，孙中山社会政治思想的集中体现。孙中山于1905年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以后，曾就其思想内容多次加以阐发。所谓民族主义，即革帝国主义走狗清封建王朝的命，反对卖国投降，反对分裂，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孙中山曾严正声明，如外国侵略者“势逼吾人，则吾人将以武力强国”；并指出：“中国在历史上向来都是统一的”，搞“分裂中国的人，一定是野心家”。所谓民权主义，即摧毁封建专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孙中山认识到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并总结历史的经验，强调指出民族革命如不与政治革命相结合，革命是不会成功

的。所谓民生主义，其内容是“平均地权”，实质是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纲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政治纲领，从根本上否定了改良主义路线，是建立在他的“变”的哲学思想基础之上的。孙中山的“变”与资产阶级改良派康有为主张的“循序渐进”、“不可躐等”的渐变不同，而是主张“突驾”——飞跃发展，革命。但由于孙中山不懂得革命的辩证法，对社会发展规律缺乏科学的认识，竟企图把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把民生主义又说成是“社会主义”，这只能是空想。

### 知 难 行 易

孙中山的知行观。孙中山从民主革命斗争的需要出发，对古代知行观问题进行了批判总结，提出“知难行易”的学说。他批判了唯心论的先验论，指出王守仁“知行合一”之说“不合于实践之科学”，“与真理背驰”。承认“行”（实践）是“知”（认识）的基础和来源，强调从事实中获得经验，从革命斗争中不断提高认识，这是符合唯物论认识论的观点。他反对“知易行难”之说，认为这既会使人忽视革命理论，又会使人害怕革命实践，所以他提出“知难行易”说有着现实的积极意义。但他不了解实践和认识的辩证统一关系，错误地在“知”和“行”之间区分难易，从而导致把理论和实践割裂开来，把二者看作是平行的独立体，实则是

“分知”、“分行”，陷入二元论。孙中山所说的“知”，是指“真知特识”，又指“科学”，他强调在科学理论上发明创造的困难，夸大理性的作用，就会离开实践第一的观点，由此又导致了他在社会历史观上向唯心论天才论妥协，把人分为“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三类，不懂得人民群众是革命的实践的主体，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本质上是英雄史观。

### “生元论”

孙中山的二元论哲学观点之一。他接受西方自然科学家关于以太和星云等假设，断言从地球的形成到人类生命的诞生，都是“物质进化”的结果，生命是在自然进化的一定阶段才出现的。这是唯物论观点。但他认为“生物之元子”——“生元”，即细胞，具有“良知良能”，是有知觉、有意志的，它既是物质进化的产物，也是精神的本源。这就陷入二元论，实质上是唯心论。由此必然导致承认离开人脑机体而存在意识，承认独立精神力量的存在。这种带有“物活论”消极因素的观点，后来为国民党反动头子陈立夫所利用，附会为他的法西斯哲学“唯生论”的理论根据。

### “民生史观”

孙中山的唯心史观。孙中山提出带有“物活论”因素的生元有知论，并从这种二元论的观点出发来探讨社

会发展的根本原因。他把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解释为“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进而提出“民生问题可说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即以从来人类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解决生存问题。这实际上是否认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而把社会发展的动力归之于人的求生欲望和本能这个主观因素，从而陷入唯心史观。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三民主义的宇宙观则是所谓民生史观，实质上是二元论或唯心论”。